

臺灣政治轉型理論的分析架構的探討

吳文程*

- 一、前言
- 二、政治轉型概念的形成與界定
- 三、政治轉型原因的探討
- 四、政治轉型過程的分析
- 五、政治轉型的結果
- 六、民主鞏固的變數
- 七、結語

本文主要是希望透過檢閱並整理評估學者針對政治民主化的現象所已發展出來的不同觀點與理論途徑，來建構一套比較完整，能夠分析台灣政治轉型的理論分析架構，從概念的形成，轉型的原因、過程、結果，到民主鞏固的問題都加以探討。本文主要的觀點是要兼顧政治民主化的『先決條件』和轉型過程的動態發展，才能充份解釋台灣政治轉型此一複雜的政治現象。這種同時觀照好幾種變數的研究途徑，當然會犧牲『簡約原則』這是理論建構的兩難。

關鍵詞：政治轉型，政治民主化，競爭性政黨體系

一、前 言

自 1980 年以來，政治民主化的浪潮，逐漸席捲全球。這股民主化浪潮的興起，不僅改變了國際政治的現勢，同時，也反映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範疇中。政治轉型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成為研究比較政治學的學者，無法加以忽視的主題之一。

比較政治學界對於政治轉型，或所謂「民主轉型」、「政治民主化」與「威權的轉型」的研究，至今數量已相當多。在這些民主化的理論中，多半是企圖找出導致民主化出現或民主建立的某一項關鍵變數，例如：現代化理論主要是倡導經濟發展或社會動員的因素對民主建立的影響與貢獻。另外，也有學者另闢蹊徑，以不同於現代化理論「先決條件觀」的途徑，而將研究焦點鎖定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動態發展，來分析民主政治的建立。

臺灣自 1986 年民進黨宣布成立、1987 年政府宣布解除戒嚴、1989 年民進黨向內政部登記後成為合法的政黨、1991 年資深中央民代全面退職，以及 1991 年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1992 年第二屆立委的選舉、一直到 1994 年省（市）長民選，以及即將來臨的 1996 年總統公民直選，臺灣的民主化程度可說是相當徹底，而且民主化的過程，也相當的迅速、平和、順利且成功。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政權崩潰、暴力頻仍，甚至轉型失敗，臺灣如何能完成和平、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副教授

漸進的民主化，自然深受全球的矚目，因此，已有些比較政治學研究者將民主化理論運用到臺灣的發展經驗上，企圖透過這些理論來解釋臺灣的民主轉型（例如吳乃德，1989；田弘茂，1989；若林正文，1988，1989；王振寰，1989；張茂桂，1989；黃德福，1989，1990；吳文程，1990；龐建國，1990；Chou & Nathan，1987；Cheng，1989；Hu & Chu，1990；Shiau，1990；Cheng & Haggard，1992）。本文的宗旨，主要就是希望透過檢閱並整理學者所發展出來的不同觀點與理論途徑，來建構一套臺灣政治轉型的理論分析架構。本文的中心論點是：對於政治轉型的分析，目前並沒有任何一個理論或單一變項，能充份加以解釋。我們必須透過同時兼顧長期的結構性因素，例如：國內外環境與經、社情境的制約作用，以及短期的領導者權變性的策略與互動抉擇的影響，才能完全解釋台灣的政治轉型。但是，這種同時觀照好幾種變項的理論分析架構，卻無法達到理論的「簡約原則」，這是本文的限制，同時也是目前欲整合各種民主轉型理論時的限制所在。

二、政治轉型概念的形成與界定

1950年代開始比較政治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發展。其研究範圍由西歐及北美地區，轉移到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並以較精確的科學方法來建構經驗性政治理論為目標（有些比較政治學者用現代化理論來解釋那些受到西方影響而發生轉變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他們最常用的分析方法就是用現代和傳統二分法的類型概念，來分析開發中國家的社會轉型（Huntington，1971：2-85）政治發展的研究在1960年代開始興起，由Gabriel A. Almond和James S. Coleman合著，於1960年出版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一書中首先注意到發展的問題。Almond不再使用現代及傳統的概念，而改用「已開發」(developed)與「低度發展」(underdeveloped)或「開發中」(developing)二個類型的概念來分析這兩種體系變遷的過程。(Almond，1960：23-24)

1966年，Almond與G. Bingham Powell合著的「比較政治：一種發展的途徑」(Comparative Politics：A Developmental Approach)一書中，對政治發展提出概念性的解釋，並研究政治體系為何發生改變。Almond與Powell認為政治發展可視為是「政治體系對社會及國際環境變遷所作的反應。尤其是指體系對國家建立、民族建立、參與及分配的挑戰，所作出的反應。」政治發展也可以政治現代化的觀點來思考，它有三項可供衡量的指標：一是結構約分化；二是次級系統的自主性；三是文化的世俗化。(Almond and Powell，1966：13)

Lucian w. Pye曾將學者對政治發展所下的定義綜合起來，列出十個意義：1.經濟發展的政治先決條件；2.工業化國家或工業化社會的政治型態；3.政治現代化的過程；4.民族國家的政治運作；5.行政與法制的發展；6.群眾的動員與參與；7.穩定與有秩序的變革；8.民主政治的建立；9.動員與權力發展的型態；10.社會變遷多層面過程中的一個面向。

在討論過各種政治發展不同的定義後，Pye歸納出衡量政治發展的三項指標：平等、體系能力及分化，構成了發展過程的核心。(Pye，1966：31-48)

Samuel P. Huntington，一位以研究開發中國家政治穩定聞名的學者，則歸納出四點政治發展的重點，1.理性化：指決策的趨於理性化；2.國家統合：指重視國家認同與基本共識的建立；3.民主化：指政治參與的擴大和政治競爭的增加；4.動員或參與：指社會動員與群眾

參與的增加。(Huntington, 1965; 387-388)

在介紹了幾位學者賦予政治發展這個概念不同意義和內涵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發展」仍是一個有待精確加以界定的概念。學者由各種不同角度切入，對政治發展提出多樣化的定義，這是因為政治發展名詞本身具有積極的意涵，因此，政治學者將他們認為重要或可欲之事物都稱之為政治發展，所以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他們使用政治發展此一概念，並不是作為分析之用，而是提供一個合理可行之路。(Huntington, 1975: 3) 換言之，許多學者將政治發展視為具有正面價值的發展目標或內容，因而沾染上某些價值偏好的色彩。

有些學者認為政治發展就是政治現代化。(Bendix, 1964; Pye, 1966: 33-36; Packenham, 1966: 194-235) 所謂「現代化」即「指一個傳統社會轉變成現代化社會的過程」。(O'Connell, 1976: 13) 簡單地說，位於傳統與現代二個極端之間，就是屬於現代化的範疇。現代化的內涵也是相當廣泛複雜的，它泛指一種多面向的變化過程，涉及人類思想和活動的一切領域。Daniel Lerner 認為現代化的主要面向包括：都市化、工業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普及、參與擴大、及大眾傳播媒介……等。」(Lerner, 1958: 438) Black 也認為，現代化所涵蓋的面向包括了知識、政治、經濟、社會和心理等五大活動。(Black, 1966: 9-26)

Huntington 曾將現代化過程，歸納出九點特徵：1.革命性；2.複雜性；3.系統性；4.全球性；5.長期性；6.階段性；7.同質化；8.不可逆轉性；9.進步性。(Huntington, 1971: 288-290) Huntington 進一步指出，在現代化的複雜面向中與政治最密切相關者，可歸納為兩大範疇：一是社會動員；另一則是經濟發展。因此，Huntington 認為「政治現代化概念，可視為是現代化的面向之一，即現代化過程的政治面向與結果。(Huntington, 1975: 4) 而政治現代化的核心內涵則包括三項特色：一是權威的理性化、二是結構的分化、三是政治參與。因此，吾人可由兩種不同的角度來界定政治現代化：一是視之為從傳統到現代政治的一個轉型或過渡；二是視之為社會、經濟和文化現代化在政治層面所呈現的徵象和結果。Huntington 強調，上述的這項區別十分重要，前者指出政治變遷在理論上應該邁進的方向；後者則僅描繪在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所實際發生的政治變化情形。這兩者之間往往存有莫大的差距

(Huntington, 1968: 31) 從 Huntington 的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後者的變化才是他主要的關懷所在。

然而，在概念上，政治發展是否就是指政治現代化？二者的關係應如何有效地界定並加以釐清。首先，將政治發展等同於政治現代化，將使政治發展概念的運用受到時、空限制。因為，現代化理論是人類歷史發展中的特殊階段，例如：民族國家的建立，乃近二、三世紀的事，如果將政治發展與政治現代化視為是同一的概念，便使此概念受到時空限制而無法探討希臘、羅馬時代的政治發展；同時，若把政治發展視為政治現代化，會使政治發展概念趨向於抽象化而使之缺乏經驗意含及系統意含，導致政治發展概念模糊；而且，將二者視為同一概念，將無法想像政治發展有倒退的可能，因為，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政治現代化是直線式向前進化的。

其次，政治發展概念本身應如何加以界定：它究竟是一個單一概念；或是一個複雜概念？許多學者傾向認為：政治發展是多層面、多功能的，不能用單一指標來衡量，因此，政治發展應該是一個複雜概念。(Pye, 1966, 45-48; Almond and Powell, 1966: 299; Eisenstadt, 1965: 99) 但是，對於這種說法仍有學者不表贊同，Huntington 就提出質疑：若政治發展包

含許多層面，那麼這些面相或因素之間到底有何關係？而且，這些層面中可能彼此發生衝突、矛盾，例如：Pye 所提出的平等、能力與分化三種現象，不見得彼此能相互配合同步發展；而 Almond 所說的結構分化、次級系統的自主性及文化的世俗化，這三個層面也並不一定會一起發展。因此，如果說政治發展之意義可以包涵很多意涵，那我們便不能明白它的精確意義究竟為何。因此，Huntington 認為應對政治發展下一精確定義：政治發展就是政治制度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Huntington 認為：若把政治發展視為單一層面，則其意涵就簡單多了。但是，這樣我們就用政治制度化代替政治發展好了，政治發展變成了一個多餘的概念 (superfluous concept)。

另一方面，政治發展應該是一種描述性概念，亦或是一種具有未來發展目標的概念？前者是指，不管政治發展的概念內涵是單一性或是具有多樣性皆從過程中來觀察其內在特性，而加以描述；而後者乃指，將政治發展想像為一具有未來目標，國家、社會皆會向這些目標移動的「目的論概念」(teleological concept)，而這種未來的目標，通常是一種具有肯定性的價值觀念。這兩種觀點都有問題，以後者來說，若吾人認為社會或政治體系應朝某方向發展，則不免將目標與事實混淆在一起，難以符合現實；而前者的說法，也令人產生疑竇，例如，一些發展甲國家的發展現象，像政變、內戰、種族衝突一等現象是否就是政治發展的內容，這些現象明顯地與政治發展所標示的目標，正好相反。最重要的是，將政治發展視為目的論的概念，往往會引導學者去從事目標的研究，而忽略政治發展過程，也就是政治事實與實際現象的研究。

最後，Huntington 認為，政治發展作為一個分析概念，不論是以「匯集功能」(aggregating function) 或「區辨功能」(distinguishing function) 的指標來加以檢視其有效性，結果都只能算是一個多餘的概念，所以我們應揚棄模仿自經濟學的經濟發展概念，而仿效社會學之以社會變遷概念，以避免在定義上與目標上的許多爭論及問題。因此，Huntington 主張，以「政治變遷」來取代政治發展概念，因為變遷並不涉及朝某特定方向前進的意涵。(Huntington, 1971: 301-305) 政治變遷的概念比較中性，學者才能以價值中立的態度來從事經驗性的研究。

自 1960 年代末及 1970 年代初，討論政治發展的學者開始進一步思考有關政治變遷的一般用詞，換言之，在某種程度上，比較政治的研究開始注意政治體系某些特殊成份的變遷，以及某成份的變遷如何關係到其他成份的變遷。(Huntington, 1975: 96)但是，學者們卻未對政治變遷的意涵做出明確的界定。Almond 將政治變遷看成是「政治系統獲得某些新的能力，一旦政治系統的能力發生了改變，則政治系統必然也會發生變遷」(Almond, 1970: 166-168)Huntington 則籠統的表示，政治變遷包括「政治系統內一切重要的變革與更動，諸如：政治結構、決策程序、決策人士的大幅變易與更替」因此，變遷概念基本上是指涉，政治系統執行功能的變化，當部份結構產生改變，整個體系也將因此發生變遷，這種變遷並未預設改變的方向。但是，這一來政治變遷此一概念的一般性和抽象程度提高，雖然適用的範圍擴大了，但也越來越無法指涉經驗世界中具體的政治現象。

「政治民主」，一直是政治發展上的核心目標之一。政治民主化的浪潮自 1970 年開始，到了 1980 年代蓬勃發展，目前已進入所謂的「第三波」(Huntington, 1991) 更有人形容「民主是一個全球性的革命」。(Rustow, 1990) 因此，政治民主化的研究也在這種大環境的變化

下，成爲比較政治研究領域最新的焦點。而民主化主要的核心過程乃涉及了所謂的「政治轉型」(political transition)。在概念上，「政治轉型」與「政治變遷」指涉的範圍不同：政治變遷的涵蓋範圍很廣，包括政權型態的改變，而政治轉型則是一種特別的政治變遷。正如研究威權統治轉型的著名學者 O' Donnell 及 Schmitter 對「轉型」一詞的界定指出：「轉型」乃指涉某一類政權與另一類政權之間的那段間隔 (interval)。(O' 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2) 換言之，由某一類型政權轉變成另一類型政權的這種政權型態的改變才是政治轉型概念的核心意涵，這種轉型不是指政治體系中部份重要結構的功能可能產生的變遷現象，而是指國家機制 (State apparatus) 與政權性質，以及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關係，發生重大轉變的問題，因而使得政治轉型概念有別於政治變遷的意含。因此，討論政治轉型問題必需同時觀照三個層面：一是政權型態或性質的轉變；二是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關係的轉變；第三是政治參與及政治競爭的轉變。雖然，爲了分析上的方便，吾人可作出這三種面向的區分，但是實際上，這三個層次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關連性，難以硬性的加以區隔。總而言之，政治變遷包含政治轉型，而政治轉型亦是政治變遷的一種。政治轉型的類型，大致又可分成三種類型：一是民主的崩潰，由極權或威權政體取而代之；二是極權政體的崩潰，轉變成威權或民主政體；三是由威權政體轉變成民主政體。台灣的政治轉型就是屬於第三類型的轉變。

A. 臺灣由威權政權轉型成爲民主政權

正如前面我們引用學者對轉型的定義中所說的：某政權型態與另一政權型態之間的那段間隔，因此，政治轉型的發生，必然需先存在有政權型態轉變的現象爲前提，否則便無探討轉型的必要。於是在這種基本的認知下，我們首先毫無選擇地必須對轉型前以及轉型後的政權型態，予以嚴格的界定，以斷定政權型態轉變現象是否發生；換言之，就是要對轉型前後的臺灣政體或理論上的類型界定，以區辨出轉型後的臺灣政體與轉型前是否有差異？是否已經轉變成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政權型態？如此一來，吾人不僅能確定轉型現象的確出現在臺灣；同時，也能更進一步掌握臺灣政治轉型的方向及其具體內涵。

在過去，學者常對各種政權做分類或發明概念來加以描述或解釋，最爲人所知的是 Aristotle 將政體依照兩項指標，即依統治人數多寡以及統治者的至的是爲個人私利或是爲國家整體公益的標準將政體做了六分法，即君主政體 (monarchy)、貴族政體 (aristocracy)、憲政政體 (polity)、暴君政體 (tyranny)、寡頭政體 (oligarchy)、以及民主政體 (democracy)。(Aristotle, 1988) 而有些學者則認爲僅需將世界上存在的政體分成「民主」及「非民主」兩類即可。但是，此種二分法並不符合類型概念的標準，因爲有些國家是介於民主與非民主之間，甚難界定，而且，這種二分法概念，實際仍只是分一類而已，「非民主」只是民主的反面，爲一剩餘的概念 (residual concept)，並非是有意義的類型概念。

到了 20 世紀，許多新興政權陸續出現如共產、法西斯及納粹政權，以及軍事執政的威權型政權，因此，所謂「非民主」概念並不完全適合運用於這些政權，因爲它們各有獨特的特性，不應將它們放在同一類型裏。爲了給這些政權類型做較好的分類，學者首先發明了或「極權政權」(Totalitarian Regime)「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的概念。根據 Friedrich 和 Brzezinski 的界定，極權政體乃有別於傳統的政權而爲一現代政權，這種政權是經由一定的

現代化後，由科技發達而建立的政權，其最重要的特性是將國家與社會約界限，加以消除，而對社會進行全面性政治化，並由政黨及其附屬團體以一種全面性的意識形態做全面性控制，大致上這種政權可區辨出六項重要特徵：1.全面性的意識形態；2.單一政黨的一元領導；3.建立秘密警察；4.嚴密控制大眾傳播媒介；5.嚴密控制軍隊；6.對經濟企業活動加以限制，建立中央計畫統制的體系。(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5)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雖然國際社會形成「民主」、「共產極權」兩個陣營，但世界各國的政體並不能清晰地以「民主」與「非民主」的對照來分類；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新興國家名義上雖然是立於民主陣營這一邊，但實際上並不符合民主政治所具備的特性。但是，對這些國家也不適合以「極權政權」來描述或解釋，因此，學者又發展出另一個新的概念，即「威權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或「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依照 Juan Linz 對威權政體的界定：「威權政體乃是一種政治體系，其為有限且不負責任的政治多元主義；沒有一有系統、條理分明、主導性的意識形態，但卻有一種特殊的心態；沒有廣泛密集的政治動員，但在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也會動員人民；此類政權大都是一人統治或寡頭統治；領導者的權力，形式上並無限制或界定模糊，但實際上，權力的運作卻可預測」。(Linz, 1964)

以往，對於民主政治的含意有許多爭論性的說法，然而為了將民主政治的意義簡化，使之不再是規範性概念或理想的類型目標，將其抽象名詞落實在現實裡，於是遂有現代民主理論的出現。Joseph Schumpeter 即認為：古典的全民參與直接民主的理論，在經驗上是不實際的。因此，Schumpeter 對民主政治下了一個嶄新的定義，他認為「民主是一種獲得政治決策權的制度性安排，政治精英彼此競爭，以爭取選民的支持及政治決策的權力」(Schumpeter, 1943: 269) 於是，在 Schumpeter 的定義下，民主只是一套決定政府人事的抉擇程序。Schumpeter 的這項定義強調了古典民主理論未提到的兩項民主運作機制：一是選舉、二是競爭。Linz 也認為民主的政治體系是指能夠透過基本的集會結社以及表達政治偏好的自由；規定正常的任期，以便保證領導人的自由競爭，使他們能使用非暴力的手段，追求統治權。(Linz, 1975: 182-183)

Robert A. Dahl 對於民主政治的看法和 Linz 相當雷同。Dahl 認為民主的政治體系對所有公民都有或幾乎都有反應性，所有公民都有下述不可剝奪的機會可剝奪的機會：(1)形成他們的偏好；(2)以個別與集體行動向其他公民及政府傳達他們的偏好；(3)政府在處理他們的偏好時必須平等地加以權衡。

為了使上述的這些機會能被保障，並一一提供給人民，於是，Dahl 提出八項制度上的保證。而這八項保證，也就構成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及標準，它們分別是：(1)人民有組成和參加團體的自由，包括合法組黨的權利；(2)人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3)人民有選舉的權利；(4)人民有被選舉權；(5)政治領袖有彼此競爭，爭取支持的權利；(6)人民有獲得充份資訊的自由；(7)公平、公正且自由的選舉；(8)政府的政策皆要向選民負責。

綜合這八點要件，一個民主的政治體系必須做到政治參與的擴大以及政治競爭的開放。凡是越接近這兩項指標的政體，就是越接近民主的體系。Dahl 認為真正完全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全民參與決策的理想，甚難在實際的世界中出現，因此，為了加以區辨起見，Dahl 將這個存在真實世界中的民主政體稱之為「多元政體」(Polyarchy)。(Dahl, 1971: 2-8)

至今，學者對於政體的分類，大致上已形成上述的三種政權類型。這種三分法，雖然無

法窮盡世界上所有的政權型態，不過較之以往的二分法（嚴格說來只能說是一分法），這種三分法，提供了比較清楚、方便的研究分析工具，供學者從事學術上的探討與分析。

許多研究臺灣政治或國民黨政權的國內外學者皆認為：國民黨政權自 1949 年播遷來台，在統治上，一直採取的是一套以黨為統治核心的「威權體制」（Winckler, 1992: 224; Cheng and Haggard, 1992: 1; 胡佛, 1993: 2-4）實際上，在臺灣進行民主轉型前，國民黨政權不僅是一個威權體制，同時，也是一種「黨國體系」（Party-state system）。所謂的「黨國體系」指的就是一黨制國家。在這種體制下，唯一的政黨可以說是國家的複製品，不論是黨吸納了國家，或者是國家吸納了黨，黨國體系皆是一種一元化的體系（a system of unitarism）。黨國體系一項最獨特的特性是它並不容許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因此，在黨國體系下沒有自發性的組織存在，這種體系是一種「封閉式的體系」（a closed system），人民不能合法的組織政黨，自由的表達不同的政治意見。黨雖僅是全體的一部份，卻自視為全體，黨國不分，因此，謂之黨國體系。（Sartori, 1976: 42-47）

基本上，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自 1949 年撤退到臺灣，光復大陸就成為國民黨的基本國策。然而，面對無時無刻亟思解放臺灣的中共，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政府於 1949 年 5 月 19 日宣布戒嚴。但是，實際上「戒嚴法」並未完全實施，人民仍可享受個人自由及他們的生活方式，不過一些政治權利則受到嚴格的限制，例如：憲法中集會結社及言論的自由，都受到的限制，所有政治集會都要獲得警察局的同意才能舉辦；所有的社會團體與組織都必須向政府登記；工人和工會沒有罷工的權利；而且自 1957 年起，新報紙的登記被暫停；此外，除了執政的「國民黨」以及「民社黨」與「青年黨」二個友黨外，不准其他政黨的成立。因此在解嚴前台灣並無合法的真正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也就不是一個競爭性的政黨體系，而是一種非競爭性的「黨國體系」。

雖然，國民黨的組織架構乃承襲自「列寧式政黨」（Leninist-Style Party）的架構，也就是說，國民黨的組織架構具有以下幾項特性：選擇性的黨員甄補、革命性及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集中化的權力中心（即中央委員會）以及政策制定的核心機構「中常會」、透過政工系統（a political cadre system）來控制軍隊，以及以黨控制國家機器組織（the state apparatus）的政策及人事，並嚴禁反對黨的存在。（Chou and Nathan, 1987: 277）但是，由於在意識型態（即三民主義）上的反共和以民主（民權主義）為終極目標，因此，國民黨實際上與共產黨的極權型政權是截然不同的：它並沒有對社會和人民進行全面的控制和動員。所以，解嚴前國民黨政權也只是較具威權政體的性格，而不是一個極權政體。

不過，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型態，也不全然與 Linz 的描繪，符節相合：第一、國民黨在四十多年來，多少是依照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來進行統治，雖然，在有些地方只是具有選擇性的適用，但大體上與只是依照領導者個人的一種特殊的心態來統治仍有些不同，「三民主義」仍舊是國民黨治國的藍圖與方針，同時也是透過政治社會化對人民進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另一方面，國民黨也禁止其他具有競爭性的意識型態（特別是馬列共產主義）或不見容於黨意的思想出現及擴散。但是，三民主義的意識型態程度比較低，比較具有彈性，並不尋求對社會全面性的控制與改造，因此與「馬列共產主義」有別。第二、雖然國民黨未能開放政權供不同的政治精英彼此競爭，並使人民有參與中央層次的選舉機會（1949~1968 凍結了二十年），但有限的選舉參與在 1950 年，便已陸續舉行。這個舉措使得臺灣人民雖然在中

中央層次的選舉參與一直要到 1969 年才獲得少數增額席位的參與機會，但在地方層級的政治參與，卻早已充份開放，形成黨籍候選人與無黨無派候選人彼此競爭的局面；同時，也因此孕育出許多本土政治精英與後來的黨外勢力。就這二方面來說，Linz 對威權政體的定義，並不能完全適用於國民黨在臺灣的威權統治經驗。

至於轉型中（後）的臺灣政體，究竟是往民主政治的方向航行或者是倒退到更加嚴厲的威權統治，甚至極權統治的型態呢？相信沒有人會質疑：臺灣的政治轉型方向一直是朝著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方向快速前進。接著，我們將根據前文所提出的民主定義，以及透過一些衡量一個國家政治民主程度高低的指標，來剖析經過民主轉型階段的臺灣政體體質是否真的有資格，能稱得上是一個民主政體或多元競爭的政體。

先從政治競爭的開放方面來看：國民黨在解嚴之前對於政黨的組成採取的是鎮壓的政策，例如：1960 年「自由中國」雷震等人組黨行動的遭到逮捕與鎮壓是為顯證。但這種「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非競爭性政黨體系，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無視黨禁，逕行宣布組成政黨之後，已告終止。國民黨當局一反過去的政策，採取容忍的態度，並且加速開放組黨的合法化，透過積極研修「人民團體組織法」（以下簡稱人團法）使得人民可以合法組織政黨。因此，當「人團法」於 1989 年 1 月 20 日，經「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的那一刻起，便象徵著臺灣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政治起飛」從此，臺灣人民只要向內政部登記（報備制，內政部並無核可權）即可依法享有組織政黨，並與執政黨進行公平競爭的自由及權利；同時，這也意謂著：臺灣過去的黨國體系正式轉變為一個競爭性的政黨體系（competitive party system）。

再從政治參與的擴大方面來說：在 1968 年以前，國民黨一直封閉中央層次的政治參與管道，只願開放與政權交替無關的地方性基層選舉供人民參與。到了 1968 年以後，一方面面臨來自民間本土政治勢力的一股參與壓力；另一方面則鑑於長期無須改選的資深代表，隨著歲月流逝而逐漸凋零，造成法統延續的嚴重危機，因此首度開放少部份的增額席位，來充實中央民意機構。但是，隨著反對勢力的茁壯以及反對黨的組成，國民黨越來越承受不起來自反對黨的強力挑戰，尤其是反對黨要求進行國會全面改選的主張，已獲得越來越多的選民支持。面臨選票流失危機的國民黨，終於面臨必須拋下沈重的包袱，走出固守老法統的心態，走向民意的懷抱。「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就是這種情境下的產物，在 1989 年 1 月 26 日經「立法院」通過後，正式為長期被扭曲的政治結構、政治參與管道以及政治競爭空間，解開一具桎梏。這些長年無須改選的資深代表們，終於在 1991 年年底前，全部退下政治舞臺。同年，「第二屆國大選舉」，是四十年來首次台灣人民能夠真正全面改選的中央層級民意代表。此時，臺灣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可以說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接著，1992 年年底的「第二屆立委選舉」以及 1994 年的省（市）長選舉，更象徵著民主化後，臺灣政治參與，已充份擴大與普及化。同時，已在「第三階段修憲」中入憲的 1996 年總統公民直選，必然將會把臺灣的政治參與推到最高峰。同時，在這個具有「奠基性選舉」(founding election) 意義與效果的總統直選後，也將意謂著臺灣的政治民主轉型，已告一段落，而民主化後的民主程度，也已達到西方民主政治的起碼水準，後民主化的工作則是民主政治的鞏固了。

其次，就與民主政治有相依存關係的大眾媒體及言論自由方面來看：後者的限制，可以說是相當的寬鬆、甚至已達到完全受到憲法保障的程度。尤其是長久以來屢屢造成朝野關係

緊張惡化的臺獨言論以及修正前的刑法 100 條中屬於言論部份的內亂罪構成要件，經過朝野緊密協商後，也通通排除在法律限制與處罰的範圍之外。換言之，凡是純屬言論、思想層次的政治活動，都可以在憲法的保障之下，公開的表達與競爭他人的認同。至於大眾媒體的開放，在 1988 年 1 月 1 日，政府正式宣布報禁解除之後，國內的報界立即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新氣象，正所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一時之間報紙的種類，突然增加；報紙的版面，不僅數量增多，同時，也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在報導內容方面，除了因版面增加而顯得多角化延伸之外，報導的深度以及內容的客觀性與中立性方面，都比以往的保守作風來的開放與專業化。無疑地，隨著政治自由化，新聞將越自由；反之亦然。

B·臺灣由黨—國—社會 (party-state-society) 的組合主義 (corporatism) 關係轉變成多元主義 (pluralism)

在 50 年代、60 年代西方政治學研究傳統中，凡有關民間社會與國家機器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幾乎皆屬於“自由—多元主義”的學術傳統範疇內。若以 Thomas、Kuhn 的說法，西方政治學在 50 年代及 60 年代，有關民間社會與國家機器之互動關係的研究一直是遵守“自由—多元主義”的研究“典範”(Paradigm)，在研究的取向、方法及範圍上，皆受該典範的指導與約束。然而，到了 70 年代，上述典範面臨了來自實證上及理論上嚴重的挑戰。由於“自由—多元主義”的研究取向過份重視及強調社會團體之社會力，反而忽略了國家機器潛在之政治力，因而導致無法解釋非西方國家之國家發展或政治變遷的現象及結果。因此，一些學者便開始鼓吹將國家機器 (State) 重新放回比較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中，即所謂的「Bring the state Back In」(Skocpol, 1979 & 1985; Rueschemeyer and Evans, 1985; Kranser, 1984; Nordlinger, 1988) 這些學者運用一種不同於以往以社會為中心的研究途徑(society-centered approach) 轉而採取以國家機器為中心的新的研究途徑(State-Centered approach)。在這種新的研究取向下，重新思考民間社會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互動關係。

Philippe C. Schmitter 在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1974) 一文中，強調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利益代表系統，而這種利益代表系統呈現出不同於以往之“自由—多元主義”典範下的利益代表型態。Schmitter 強調：「建構這種利益代表系統理論，是爲了提供一種不同的利益政治典範的分析模型。」(Schmitter, 1974: 95) 在面臨來自國內與世界資本主義之存在及發展的壓力之下，傳統“自由—多元主義”下的多元利益團體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互動關係、運作模式與組織結構，已產生重大的質變。Schmitter 在該文中有系統地闡述這個有別於多元利益代表系統的——“組合主義”(Corporatism) 之內涵、次類型、結構特質與起源。

什麼是組合主義呢？Schmitter 對“組合主義”的定義是「組合主義可界定爲一種利益代表系統，在此系統中，所有組成份子組成有限數目、單一、強制性、非競爭性、層級性及功能分化的團體，並由國家機器所認可及核准，且授予代表性的獨佔，用以交換對它們的領導人之選擇及需求、支持之表達的控制。」(Schmitter, 1974: 93) 由上述的定義中可清楚地看出在「組合主義」下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之間呈現出一種相當緊密結合的關係，國家機器能輕易地將民間社會納入體系的運作中；而民間社會中的團體在獲得「準法律地位」後，

能成爲權威機關，在整個公共生活中，代理國家機關並負擔一些責任。

然而在“自由—多元主義”傳統下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機器往往被視爲是一個中立性的角色或如同民間社會中的利益團體一般地競逐本身的利益，而與這些團體立於同等地位；或只是一個仲裁者，以確保體系的共識及正當性。總之，在“自由—多元主義”觀點之下，國家機器基本上是一中立性的體制，國家行爲並未與社會偏好之均衡相牴觸，反倒是反映了社會或保持社會間之平衡而已。因此，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的團體之間並不存在容納或控制的關係，同時，民間團體也未能獲得「準法律地位」或代表性獨佔。可見，組合主義和多元主義在本質上、運作上、制度設計上皆大相逕庭。因此，我們不妨可將統合主義與多元主義視爲是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關兩種截然不同的型態。

在「有限多元」的基礎上，威權政體通常是以所謂「組合主義」的原則來組織及統合社會的利益與力量，這是指它會抑制自主性及自發性的社會利益結合，而設定若干民間團體，由權威當局認可的代言人，透過設定的程序和管道，跟黨政機構的相關部門打交道。民間團體之間缺乏橫向的聯繫，而田黨政機關以縱向串連方式來整合各類社會利益及力量。（徐振國，1990：12）因此，在威權統治的基礎上，透過這種「有限但不負責任的多元」將社會與國家機器關係的界線模糊化，以利威權統治的運作。換言之，「組合主義是威權政體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徵」（徐振國，1990：13）

國民黨在臺灣四十年來的威權統治過程中，相當程度也是以「威權—組合」的方式來維繫國家機器對民間社會的監控與支配。國民黨和許多團體維持一種有機的連結關係，在某些情形下，對於重要的物質與人力資源的政治控制，相當嚴密，尤其是重要社會團體主要幹部的改造任命，國民黨往往透過強力運作的方式，進行全程干預。一些主要的社會團體，例如：農會、工商業團體、工會、教師和學生團體…等，幾乎都在國民黨的嚴密掌控中，這些團體往村：透過選舉與國民黨維持一種政治上的「恩寵依恃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所謂的「恩寵依恃關係」是指稱在社會上經濟社會地位不平等的人，彼此之間所形成的一種不平等或服務的交換關係。（Powell，1970：411-425）透過這種交換與互惠關係的建立與運作，國民黨往往較易動員團體成員在選舉中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但是，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使得臺灣民間社團組織蓬勃發展，在1952年時候，臺灣大約有2,560個合法登記的民間團體，到了1988年則增加到了12,605個（CEPD，1959：303）從1980年代以來，由於臺灣社會結構日趨複雜以及民間自主意識抬頭，使得某些利益團體的運作，逐漸擺脫了國民黨的控制走向自主運作的路線，甚至成爲在野政治勢力的外圍組織（龐建國，1993：304）根據國內社會學學者蕭新煌的分析，到1989年爲止，至少有18種社會運動出現，向國家機器提出他們的要求，其中包括一些諸如：工人、農人、學生、婦女、教師及知識分子…等團體，向國家統合式的控制模式，提出挑戰（Hsiau，1992：59）另一方面，由於許多團體及其他次級性組織能透過私人經濟部門取得收入及資源，因此，減弱對國民黨的依恃。

總之，在過去利益團體是由政府或國民黨來設置、允許及資助的，逐漸地，它們的組織形式變得更加自動自發；同時，它們的功能也越加具自主性。經濟發展帶動社會變遷，出現了許多新的利益團體，例如：消費者保護團體、環境保護團體、公害預防團體…等，現在許多早已成立的團體，如：青商會、獅子會、扶輪社…等，在表達他們的利益時，也變得更爲

積極有力。這些新舊的利益團體利用遊說民代和政府官員來進行活動。面對日趨多元化及自主性的民間團體，國民黨及政府必須提供一些表達這些利益的管道，不能再宣稱黨是表達這些不同利益的唯一管道了。因此在台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已逐漸從一個組合主義的體系（corporative system）轉變成一個「多元主義的體系」（pluralist system）。祇是這種轉變的過程需時較久，至今尚未全部完成。

C. 臺灣由非競爭性政黨體系轉變成競爭性政黨體系

基本上，如前文所述，國民黨四十多年的統治已經慢慢的從以往的威權型態朝民主的腳步邁進，臺灣的政黨體系也由以往的非競爭性的黨國體系轉變成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四十多年來，國民黨為回應選民革新求變的要求，已經從一個革命性、排他性的政黨，慢慢轉變成一個實用性、包容性的政黨；同時，也因為有了這樣的轉變，臺灣的政治體系才能從原先的非競爭性的黨國體系跨入競爭性政黨體系的門檻。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從 1969 年開始的政治參與競爭的開放：起初國民黨對反對力量的政策是十分嚴厲的，在大陸時期國民黨採取的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政策，這是屬於非競爭性的黨國體系。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只有兩個被稱為「友黨」但政治上不相關的小黨存在：「民社黨」和「青年黨」，在這段期間，不同的地方選舉中沒有組織的真正獨立的反對黨存在以及黨與黨的競爭，只有國民黨的候選人與少數無黨無派的候選人之間的競爭，這樣的競爭受到很多的限制，自然沒有實際競爭來的那麼有意義。1960 年一些「自由中國雜誌社」的「自由派」大陸省籍知識分子，試圖與這些無黨籍的台籍地方政治菁英聯合成立「中國民主黨」，但是，不旋踵主要的組黨者雷震、傅正被補，「自由中國」被停刊，「中國民主黨」也就流產了。

1968 年 3 月 26 日，「國家安全會議」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辦法」，首度擴大台灣人民的政治參與到中央層次，也提供臺灣本土政治菁英參與中央層級政治的機會。整體說來，1960 年代末期和 1970 年代初期，在臺灣長大並接受國民黨教育的新一代年輕台籍政治精英，開始進入選舉政治。1972 年的選舉中，正式出現所謂的「黨外」勢力，接著，在 1977 年的選舉中，贏得預料之外的勝利，且在往後的歷次選舉中，通常贏得約 20%~30% 的選票。反對勢力透過選舉而壯大，國民黨以舉辦各種不同的選舉，並且逐漸擴大，由地方到中央層級的政治參與的方式，容忍反對勢力的成長，黨外人士被允許出版對國民黨的政策具高度批判性的雜誌及書刊，最後，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黨外」終於宣布組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針對民進黨的出現，國民黨不僅沒有依法取締及逮捕反對黨領袖，反而加速一連串的政治改革，以及與民進黨進行正式的溝通會議。1989 年 1 月 20 日，「立法院」通過「人團法」修正案，不僅使組黨獲得合法化；同時，也將政黨納入法律的規範與保障中。立法院在通過「人團法」修正案後，也立即通過「選罷法」的修正案，正式提供黨與黨競爭的法律規範。

對於威權政體的崩潰或轉型的研究，自 1980 年代開始，逐漸受到比較政方學者的重視。在 1978 年到 1986 年間，有關政治轉型進行民主轉型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對南歐的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的秘魯、玻利維亞、烏拉圭、阿根廷、巴西一等個案的觀察上。由是，也發展出一系列有關政權變遷的原因、過程以及結果的假設。而這些假設也被廣泛運

用在一些晚近民主化國家，如土耳其、智利或東南亞—菲律賓、南韓、泰國…等的轉型過程研究上。但是，由於實證的現象相當複雜，同時，個案之間也存在著高度的異質性，因此，學者所發展出來或運用的研究典範，也就相當分歧。於是，對於威權政體的民主轉型過程的比較性分析，也就引發出許多方法論上的爭辯，尤其是對於轉型的原因、過程以及結果的模式，學者都沒有理論上的共識。(Ethier, 1990: 3) O' Donnell、Schmitter 與 Whitehead 等人在 1986 年合力出版了一套有關威權政體轉型的叢書「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egime」，不過，這套叢書並未能對民主轉型的前因後果，提供一個全盤性的理論或分析架構，只是針對威權政體的民主轉型過程，做細部的分析，因此，仍無法滿足迫切的研究需求。

從現實的觀點來說，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一直是許多學者急欲透過這些理論，企圖加以解釋，並藉此用以驗證理論的個案，許多國內外著名的比較政治學者也紛紛表示，對台灣這個個案具有高度的研究興趣。然而，同樣地，以各種不同角度或觀點為出發點的分析研究途徑，對於同樣是具高度複雜性以及獨特性的台灣個案，在解釋上以及分析上的適用性與解釋力，難免也引發學者之間的爭辯。然而，真正從事針對理論本身進行純理論性的檢閱、整理與批判的作品，卻較罕見。因此，本文將繼續理論分析架構的探討，盼能藉此引發學術界先進的興趣與指正。

近期有關探討政治民主化之相關文獻中，大致上，可說是受到二種相互競爭之理論途徑 (theoretical approaches) 所支配，其中一個是集中焦點於探討民主之「先決條件」(preconditions)，在論證內容上，則強調政治民主是快速經濟成長和社會變遷的結果。也就是說，政治民主的出現必須以社會中出現一些有利的環境及條件為前題之下，才可能實現，因此，「先決條件途徑」的特性在於強調大環境之結構因素對於政治民主之實現，扮演著不可或缺的決定性影響。而這種先決條件之假設，也使得該研究途徑襲染了濃厚之決定論色彩。

另一個理論途徑則將焦距對準在社會中民主勢力出現、成長及運用策略，終而獲勝的過程。這種「過程取向途徑」的特色在於確定政治變遷的媒介(agents)、檢視他們追求民主政治的原因，並分析他們在面對國家機器和可能的聯盟夥伴時的協商情境。這種分析途徑將民主規則及制度，當做是競爭的政治勢力之間明示或暗示的談判結果。(Cheng and Haggard, 1992: 3)

除了上述的區分外，另外，Adam Przeworski 則將政治轉型的研究區分出二種途徑：一是「巨觀、整體論的研究途徑」，其重心放在客觀環境條件的分析，而結論多傾向於決定論。另一是「微觀的研究途徑」，其焦點集中在研究政治行為者及其策略。(Przeworski, 1986: 47) 實際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上述這兩種分類在內容上是重疊的，「先決條件」和「巨觀、整體論」途徑所著重的焦點，同樣都是長期經、社結構面向之研究；而「過程取向」和「微觀途徑」也是口徑一致的。

但是，從理解的角度來看，「先決條件」和「過程」研究取向的區分或許更能突顯出彼此在分析角度上的差異，同時也更能使人望文生義。因此，在本文中將採用這種區分以進一步有系統地將有關民主化之文獻做一番整理，以及對這些理論對台灣民主轉型個案在解釋力方面，提出個人的檢討與批評。一個完整的政治轉型研究應該至少包括三個不同但卻彼此連帶相關的部份或階段，亦即，應包括轉型原因、轉型過程以及轉型結果的探討。

三、政治轉型原因的探討

許多採取先決條件為焦點的研究，大抵是試圖從民主與其他因素之間的相關性，跳躍到推定這些因素是原因民主政治是結果的結論，因而傾向找尋民主的經濟、社會、文化及心理原因。Huntington 曾將這些與民主政治出現有關連的因素或先決條件，歸納成四個廣泛的範疇。這四個因素分別是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外國的影響。(Huntington, 1984: 198) 本文中將對 Huntington 的歸納，以另一種方式劃分成兩大部分，即：國外因素及國內因素。而後者則包含有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因素來進行論述。

A. 國外因素

Alfred Stepan 曾對「通往民主化的道路」整理出八條「再民主化」的途徑，其中有三項與國際因素有關，包括：在外國佔領後國內的民主重建；經外國解放後，國內重新改善民主制度；在外力監督安排下建立民主制度。(Stepan, 1986: 64-84) 很明顯的，在臺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中，並未出現 Stepan 所說的國際戰爭、國外武力干預或國際監督的影響。Huntington 也強調外在的影響力也許會影響一個社會往民主或非民主方向移動，尤其軍事征服是民主及其他政治體系擴張的方式之一，因為，軍隊夾帶著意識型態，所以當美國軍隊走到那裏，民主的意識就傳播到那裏。此外，區域性的外力干擾，也會對一個社會內部的政治發展發生重要影響，例如：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的出現，鼓舞了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之民主制度的出現。因為，民主政治的建立是獲得成為共同體成員之經濟利益的必要條件，於是共同體的會員權也就被視為民主穩定的一項保證。(Huntington, 1984: 205-206) 從 Huntington 的論點出發，有人認為美國的壓力與中共意圖孤立臺灣的外交作為等國際因素的影響力，是國民黨追求民主化運動的重要因素。(Nathan, 1992: 207-219)

對於這樣強烈的論調，基本上，我們持質疑的態度。誠如 Whitehead 所云：第一、在沒有外來行動者的直接干預，例如：德國或日本的情形，或者在沒有重大的涉外事件，例如二阿根廷在軍事上為英國所擊潰時，外在因素是不可能破壞民主化的過程。(Whitehead, 1986) 外在因素可能助長或阻礙民主的轉變，但問題的癥結不在於外在因素是否存在，而係在於國內行動者是否能利用機會或使這些外在因素所產生的壓力減低到最小的地步。(Cheng and Haggard, 1992: 16) 因此，對於這種難以精確加以衡量與估計的國際因素對臺灣的政治轉型的重要性，實無須過分強調。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民主化運動，自 1970 年代以來逐漸形成一股時代性的世界潮流，在 1974 年到 1990 年之間，至少已有 30 個國家趕上「第三波民主化」列車，這個數目幾乎已達到先前民主國家數目的兩倍。(Huntington, 1991: 12) 而涵蓋的空間區域，更是橫跨了拉丁美洲、歐洲及東南亞，甚至近年來，蘇聯的解體與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因此，臺灣的民主化運動，多少也受到這股潮流示範效果 (demonstrating effects) 的影響。

B. 國內因素

1.經濟因素

在現代化理論的許多論證中，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學者爭議不休的焦點，尤其是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更是學者之間不斷在辯論的一項論題。在強調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存有正相關的學者中，Seymour Martin Lipset 一直是人所皆知的個中翹楚，他的一篇收錄在得獎著作「政治人」(Political Man)一書中的論文「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mocracy)不僅常為學者在論證上所引用，更形成一種研究上的典範(paradigm)。(O'Donnell, 1973: 3)他在這篇文章中試圖用實證資料來驗證一個頗為流行的看法：民主政治只能存在一個較為富裕的社會中。也就是說，經濟成長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Lipset 利用財富、工業化、教育以及都市化等四項指標，來衡量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然後研究歐洲、北美洲及拉丁美洲地區，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民主程度。他的發現及論點大致是認為：財富、工業化程度與都市化程度這三項指標與穩定民主存在正相關的關係；而教育程度這一項，不僅是民主的充份條件，且接近必要條件。換言之，Lipset 發現：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是息息相關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政治就越趨於民主，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Lipset, 1960: 48-60)

針對 Lipset 的理論，學者間有為數不少的人提出經驗上的反例來加以駁斥。(Cutright, 1963; Huntington, 1985; Moore, 1966; O'Donnell, 1973) 這些學者大抵認為：快速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呈現出來的是一種負向的相關，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地區，為了達到經濟發展目標，出現的卻是非民主的威權政體。然而，若以 Lipset 的理論來解釋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在某些程度上多少是可以說得通的。在過去四十年來，臺灣的經濟成長，可稱是一奇蹟，並可說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成功典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臺灣的經濟仍舊以農業為主，一半以上的勞動力都投入在農業的發展上，然而，快速的工業化和經濟成長帶來物價的穩定、低失業率及利潤的分配，國民生產毛額每年的平均成長率在 1950 年代為 8.2%；1960 年代為 9.4%；1970 年代為 9.9%。隨著經濟成長，使得貧富差距從 1964 年的 5.33，減至 1973 年的 4.29。戰後的經濟發展，大致可劃分為 1950、1960、1970 三個年代：1950 年代，可說是第一階段進口替代工業，通貨膨脹已被控制，施行土地改革使經濟穩定，產品主要是化學肥料、紡織品和水泥；同時，食品加工也變成重要的製造業；1960 年代，開始拓展外銷，許多租稅的優惠，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在 1960 年代末期，電子業成為成長最快速的行業，年成長率高達 38%。1970 年代，是個外面混亂內部需要整頓的時代，1974 年遭受到石油危機的重擊，然而，臺灣成功的經歷這次的風暴，經濟成長仍是驚人的，在 1970 年代早期，勞工密集的工業開始轉型成為以資本和科技為基礎的重工業，政府大力推動十大建設，臺灣工業產品的年成長率，在 1953 年至 1962 年，為 11.7%；1963 年到 1972 年，增長為 18.5%；到了 1973 年與 1988 年，則為 9.3%。而工業產品的進口，從 1953 年的 8% 提昇到 1980 的 90.8%。工業化以及高度經濟發展，影響了社會結構的變遷，同時，也提高了國民所得。

從上述的統計數字所顯示的意義來看，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似乎與 Lipset 的理論相當符合；換言之，Lipset 認為政治民主，在越是經濟發展的社會，越能存在的假設，在臺灣已獲得實證上的驗證。誠如 Lucian W. Pye 所說：臺灣可能是所謂經濟發展將導致民主與促成多元主義崛起，並因之削弱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之威權統治基礎之理論

的最佳實證。(Pye, 1985: 233) 但是, 光從一些經濟發展指標的統計數字來推論其與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 難免會顯得有些粗糙, 不夠精確。就如學者 Dankward A. Rustow 的尖銳批評, 既然 Lipset 講明是「民主的某些社會要件」(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所謂「要件」, 就不應只具有相關關係, 惟有真正的唯一既充份又必要的條件, 才具有因果關係, 因此, 明顯的 Lipset 所提出的相關性, 並不同於因果關係, 因為, 相關並不具有時間上的先後順序或關係上的方向性。(Rustow, 1970: 342) 因此, 當我們在思索經濟發展對臺灣的政治民主化扮演何種角色時, 我們必須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 避免輕率地將理論套用在個案上, 其次, 更不能輕易的採取經濟決定論觀點。

2. 社會因素

順著「經濟發展可促進政治民主」的思維理路, 一路延伸下來, 有些學者嘗試進行分析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結構分化現象對促進政治參與或政治發展的影響與貢獻, 換言之, 這些學者開始轉向研究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或政治民主之間的另一項變數—社會結構的變遷。而這種理論研究焦點的修正, 也正說明了以往認為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的單純的雙變項關係—經濟發展直接帶動政治民主—並不成立。這種理論上的修正, 除了可彌補經濟決定論在論證上的不足與難以建立起明確且具體的因果關係之外; 並能將分析的視野, 更加擴展到結合了經濟、社會與政治層面的互動關係, 提供了更嚴謹的分析邏輯與變數關係。這些學者就是一般泛稱之「社會動員學派」(Social Mobilizationists)。在這個現代化理論的研究支流中, 要以 Karl W. Deutsch 的「社會動員與政治發展」(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文為代表。在 Deutsch 看來, 所謂社會動員是「一種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舊有的社會、經濟、心理上的主要信念, 被腐蝕或打破, 人們獲得新的社會化或行為模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包括兩個階段: 1. 從舊有環境、習慣、信念層面, 連根拔起或完全切斷的過程; 2. 人民學習新的生活方式, 開始從傳統地區的孤立、政治的冷感, 轉變成廣泛、深入地介入現代化的複雜生活方式, 其中也包括實際與潛在的大眾政治參與。

由於「社會動員」概念牽涉如此複雜的面向, Deutsch 便以七項指標來加以運作化, 這七項指標分別指涉的是一國人口中生活在現代化各個面相的經驗比例、暴露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比例、改變住所的比例、居住於城市人口的比例、就業人口中非農業人口的比例、識字率以及個人平均所得。Deutsch 在這七項指標中, 分別訂有不同標準的門檻以確定變數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關係。在這個動員的過程中, 值得注意的就是所謂「副作用」的現象, 也就是指「社會動員」對政治發展所帶來的影響。簡單的歸納 Deutsch 的結論: 「社會動員」將使得政治相關階層擴大(即政治中必須列入考慮的人增加)政治權力也會由傳統的農村中政治精英, 轉移到具有現代觀念與能力的都市精英手中、政治甄補結構與溝通管道, 都產生重大改變、人民政治參與擴大, 群眾政治時代來臨, 最普遍的象徵就是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擴大及普及化,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動員」有助於在民族國家的架構中, 建立起政治認同與歸屬感, 促進國家的統合。(Deutsch, 1961: 493-514)

除了 Deutsch 從一國人口的社會心理轉變過程出發, 探討社會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外, Norman H. Nie 等人也針對社會結構與政治參與之間的發展關係, 進行研究。基本上, Nie 等人認為: 經濟發展將徹底改變一國的社會結構及公民的社會生活, 而這種社會變遷對政治

行為及政治體系運作的影響，將是無數且複雜的。這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中經濟發展的政治結果，是無法輕易地與該國在歷史上的社會割裂、既存的社會模式以及發展過程本身的時機因素分離。這種複雜且多變的社會變遷有些是經濟發展過程所無可避免的結果，而這些變遷將對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參與，發生普遍及深遠的影響。換言之，經濟發展並非直接影響政治，而是透過社會結構的變遷間接對政治產生影響，因此，社會結構因素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變數的角色。在 Nie 等人看來，社會結構的改變，大致分成三個面向：一是階級結構：當一國經濟越發展，就越需要更多技術工人，且也有越來越多的社會流動機會、教育機會，故農業時代三角形的社會結構型態，逐漸轉變成鑽石型的結構，中產階級興起，非農業的服務業出現，因而改變了社會的階級結構。二是組織結構：當經濟發展後，組織的下層結構，便趨於複雜分化及專業化，社會生活趨於組織化，新團體不斷出現，團體數量增加，由於團體的組織動員，使得政治參與擴大，對政治體系的需求和壓力增加。三是住所的改變：人口聚居於城鎮中，離開農村，走向都市，尋求教育及工作機會，因此，造成了都市化現象。

Nie 等人也以個人為觀察單位，企圖透過這三方面的改變來觀察個人政治參與是否發生改變。經過實證分析 Nie 等人發現：住所改變的影響力並不顯著；只有階級結構與組織結構的改變，才與政治參與改變有密切關係。經過更深入的分析，Nie 等人證實了經濟發展的確是需先影響階級與組織結構，然後，再反映到政治參與的變化上，不過，階級與組織結構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並非是相同的，也就是說階級結構在影響政治參與之前，必須先引起政治態度的改變，才能對政治參與產生作用；而組織結構卻無需再透過政治態度這個中介變數，而能直接影響政治參與。因為組織具有動員力量的本質，以及提供誘因與心理滿足的潛能，因此有時政治參與往往是團體組織動員的結果。(Nie, Powell and Prewitt, 1966: 406-435)

Barrington Moore 在「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 一書中的觀點，傾向於強調總體的社會及階級結構關係對於政治民主的影響。Moore 企圖尋找形成不同類型之政體的重要結構要件，也就是探討在各個農業社會中，是否存在結構上的差異，使得在若干情況之下，議會民主得以出現；而在其他情況下，卻顯得困難重重。根據 Moore 的解釋來說，似乎“資產階級衝動”是民主化出現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變數。所謂“資產階級衝動”指的就是一些地主或小農階級能否順利地完成產業結構的蛻變（即商業化）成為資產階級。同時，這些資產階級與君主、貴族勢力相抗衡，並與城市之間形成極可觀的共利形式。這種農業商業化的過程為英、美的政治民主提供了穩健及有利的歷史結構背景，因此，Moore 更直接論稱：「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制度。」(Moore, 1966: 418)

縱觀 Moore 的分析，明顯地，Moore 所強調的是整個社會結構因素對於政權型態的差異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力。不同的社會結構型態，限制了某種政權類型出現之可能性。但是，Moore 對於實際政治過程的分析，似乎也在這種過份地強調社會結構因素的決定性下，被忽略、簡化了，這也是 Moore 的論證有所未盡完善之處。再者，Moore 的觀點也無法解釋 Huntington 所謂“第三波民主”的實際案例。(Huntington, 1991) 基本上，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其民主化的動力並不是來自國內資產階級衝動的強度，而是深受各種國內、外其他因素所左右，例如：東歐民主化的主要關鍵是在於前蘇聯的態度。因此，可以明顯地看出 Moore 的結構觀實受特定歷史時空條件所限制，或許它能解釋某一特定歷史條件與背景下

之特定型態的民主化，但畢竟適用性仍相當有限。

若依照上述理論的假設來進行臺灣個案的解釋與分析，除了 Moore 的論點之外，無疑地臺灣四十年來社會變遷的走向，相當符合這些理論的假設。隨著經濟發展脈絡的演進，我們可以選擇幾項社會動員指標作為驗證上的參考依據，在都市化方面，根據學者的統計分析，臺灣地區人口分佈，在這三十多年當中，呈現快速都市化的趨勢，以居住在五萬人口以上市鎮的民眾，佔全台灣人口的比例來說，1956 年時大約為 31%，到了 1960 年成為 40%，1970 年為 53%，1980 年為 60%，1989 年則為 64%。明顯地，伴隨工商業的快速發展，臺灣地區人口也快速往都市地帶遷移。今日的臺灣，毫無疑問地，已是一個高度都市化社會。（龐建國，1993：16）在職業結構方面，在 1952 年時，有 56.1% 的就業人口是從事農業生產；16.9% 從事工業生產；27.0% 為服務業，到了 1988 年，則比例分別為 13.7%：42.6%；43.7%。（CEPD，1989：16）明顯地，隨著工業部門與服務業的快速增長，相對地，農業人口日趨減少，社會中的職業結構與階級結構，將產生重大變化，尤其是中產階級的逐漸膨脹。在社會組織結構方面，據統計，臺灣地區社團組織的數目，195 年時，有 2,560 個，到了 1990 年，則增加至 13,766 個，增加了五倍多，同一時期，參與社團組織的人數，從 1,316,000 人上升到 10,895,000 人，增加了八倍多。至於團體數目，更從 2,844 個躍升到 241,964 個，增加了八十五倍。（龐建國，1993：38-41）另外，在教育水準方面，1952 年時 84.0% 的及齡進入小學接受教育，至 1989 年的時候為 99.9%；1952 年時只有 34.9% 的小學畢業生能進入初中就讀，到了 1989 年已高達 99.1%；1952 年時 57.0% 的初中畢業生能繼續進入高中，1989 年時提昇至 79.5%；在大專教育的層次上，1952 年 26.3% 的高中畢業生能夠進入大專學校，到了 1989 年，這項比例提高到 45.5%。台灣人民教育程度逐年的普及與提昇，從上述的數字中自可了然。（CEPD，1989：290）顯然地，臺灣已進入一個與西方工業化社會相當類似的高度社會動員程度。總之，中產階級及民間社會力量之興起，及其自主性政治意識之覺醒，對臺灣政治結構產生了明顯的衝擊，從一黨威權體制的逐漸鬆動，到政治結構日趨自由化及民主化，都產生了明顯的促進作用。（朱雲漢，1989：1）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不論是經濟發展或社會動員，這兩個變數與政治發展之間，不僅無法在所有不同的個案中，獲致一項通則，同時，關係也並非那麼的直接與單線式發展；換言之，民主政治不可能由天而降或是單純的只是經社發展的附屬品，任何制度的出現，都是人類具體行動的結果，而背後支持這種行動取向的動力，自然是人類的某種偏好或某種價值體系，簡單說，就是文化因素，因此，文化因素就成為銜接經濟社會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媒介或中介變項“經社結構的變遷，將是透過改變個人的價值體系或認知、態度後，再進而反應到對現存政治制度的滿意與否，於是，在探討經社變遷與政治發展或政治民主的因果關係時，文化變項也就受到重視而被納入研究架構中。

3. 文化因素

許多研究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關係的學者，也大都發現政治文化在二者之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例如 Lipset 認為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雖有強烈的正向關係，但政治信仰態度與價值，卻是這種關係的重要中介變項。（Lipset，1960）又如 Ronald Inglehart 也曾透過蒐集超過 20 個主要歐洲國家的調查資料發現，生活滿意度、人際間的信任度、拒絕革命性的變

革等變數，不僅與經濟發展具有高度相關，同時，也與穩定民主存在著高度相關性，因此，他認為：政治文化可能是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一個關鍵性的連結。(Inglehart, 1988: 1203-1230) 實際上，對於政治文化與民主關係，自 Aristotle 後，便一直深受重視，不過，在近代的比較政治學領域中，對於政治文化與民主之間關係上的探討，最重要的作品，應該是 Almond 與 Verba 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 1963) 一書。在 Verba 看來，政治文化是指「對體系的實徵性信仰、表意的符號，以及價值，而他們界定了政治行為發生的情境，是政治活動的主觀取向，包括一個政治體系最高遠的理想以及普通一般行為規範。」(Verba, 1963: 9)

而政治文化的內涵，大致上可分成三種型態：一是認知取向——涉及對政治體系的認識與信仰；二是情感取向——指對政治體系的感覺成份；三是評價取向——包括對與政治體系表現有關之價值的政治評價與判斷。(Verba, 1963: 15) 因此，政治文化是一種體系成員對政治事務在態度上的集體取向，這種取向的對象，大致上分成四個主要目標：一是對整個系統；二是對輸入過程；三是對輸出過程；四是對個人本身。(Verba, 1963: 17) Walter A. Rosenbaum 曾將多位學者對政治文化所指涉對象，加以演繹為較具體、可實證研究，甚至可予以量化的運作性界說。根據他的整理，大致上可分成七項，包括：政治認同、政治信任、對政府的態度、體系規則、政府效能、政治參與以及輸入和輸出體系。(Rosenbaum, 1975: 9) 這些指標，隨後也就陸續出現在學者對各國政治文化差異之比較性研究或政治文化變遷的個案研究中，被廣泛地接受及運用。

為什麼政治文化對於了解政治民主是重要的變數呢？根據 Almond 與 Verba 的研究發現，或許就如 Almond 所說：政治文化是政治態度、價值觀、感情、信仰、技術的一種特殊分配，正像人的態度影響人的行為一樣，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影響著該國公民和領導者在政治體系中的行動。(Almond and Powell, 1988: 40) 因此，文化因素對於政治體系的變遷，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政治文化或多或少能決定政治制度與政治行為。雖然文化的變遷是緩慢漸進、具有持續及穩定性，但一旦政治文化發生改變，則勢必將對政治發展的過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對於政治民主的出現或持續而言，道理也是相同的。

Almond 與 Verba 認為：「混合型的公民文化」(mixed civic culture) 是一種理想型的民主的政治文化，因為，在其中有一部份公民對政治具有積極的態度，但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採取消極的態度。(Almond and Verba, 1963: 474) 簡單地說，就是體系成員對政治的整體表現，呈現出一種有點狂熱，但又不會太狂熱的中庸型政治文化。這種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具有許多與民主政治相容的特質，例如：政治信任、公民服從、政治效率以及政治參與…等，這些民主特質的出現，將有助於穩定的民主政治出現與生存。因此，研究民主政治發展或民主轉型，政治文化理論雖然曾一度面臨來自「依賴論」「新馬克斯學派」以及「理性抉擇理論」的嚴重挑戰，但目前政治文化此一變數，已逐漸受到重視。(Diamond, 1993, 2)

近年來國內對於政治文化變遷與民主轉型關係的研究並不多見，大體上除了早期臺大胡佛教授等人曾試圖建構出政治文化的量表來測量國人的政治態度外(胡佛, 徐火炎, 1983)，未見有其他較為成熟的研究或論文發表。根據胡佛與朱雲漢認為臺灣快速工業化的結果使民主政治文化逐漸形成，透過選舉而構成民主化的動力。然而，研究中也發現臺灣民主政治文化並未取得優勢，反而是威權主義式的政治文化主導民眾的價值與信念。(胡佛, 1989) 因

前流行的政治價值可能會型塑此，究竟政治文化對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發揮了多大的推動力，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觀察及分析的變數。

綜合說來，無人可否認影響民主政治秩序的經濟及社會及文化先決條件，已存在臺灣。(Huntington, 1992 : X) 但是，就理論上來說，這些統計上的經、社指標數字，仍無法清楚告訴我們政治民主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光是有先決條件，實際上並不能提供任何政治民主化的保證，正如 Huntington 的論述「經濟發展可能迫使傳統政治制度的修正或廢除，然而經濟發展卻未決定將以何種政治體系來取而代之，它們可能為其他因素所型塑，例如：社會基礎文化、精英的價值或外力影響……，如果說「轉型地帶」(transition zone) 這個概念是有用的話，那麼經濟發展將在一個國家的歷史上製造出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政治菁英與目出一些選擇，而這些選擇將對該國未來的演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Huntington, 1984 : 201-202) 因此，我們甚難在這些先決條件因素中，找出單一變數能夠完全解釋民主政治的出現或建立，就如 Huntington 的評論說：沒有任何一項先決條件足以引起民主發展…民主政權的出現，需要這些先決條件的某種結合，但這種結合的本質，可能彼此大不相同，因此不僅需看表現出的是什麼樣的先決條件；同時，也需視那些條件所帶來的負面強度，一項有利條件的缺乏或一項有力負面條件的出現，都將會推翻其他已出現之有利條件，而阻礙了民主的發展。(Huntington, 1984 : 214)

換言之，這些經、社及文化先決條件或因素，只具有部份的解釋力，而這種解釋力有限的缺憾，或許是來自理論上的前提預設，即歷史社會的發展，難以擺脫結構性的限制，在結構的侷限下，未來的命運是注定好了的，企圖進行短期操作的任何努力，只是徒勞無功罷了。換言之，即所謂「形勢比人強」。於是，這種理論預設，難免落入「結構決定論」的窠臼之中，政治發展(依變項)永遠受制於經、社(自變項)的變遷；政治是被動的、缺乏自主性。但是，實證經驗卻顯示出，民主的出現也有其政治因素，也就是指「不同階級或社會團體之間的權力鬥爭或平衡。」因此，引發社會共識發展的經、社以及或文化的轉變，只能被認為是「民主協定」(democratic pact) 的結果或民主鞏固的條件。(Ethier, 1990 : 13) 其實，政治、經濟、社會三者是互動的，三者相互影響，把政治民主化一直視為依變數，經社發展視為自變數是不妥的，政治民主可以是自變數，影響經社發展(依變數)。

四、政治轉型過程的分析

由於以“先決條件觀”來研究政治民主化的問題，呈現出一項共同的缺失：基本上，它們皆將政治因素當成被動的依變項；而經、社及文化等因素為主動的自變項，因而往往便忽略了政治因素的自主性，缺乏對細部的政治過程進行分析研究，因此也就無法周延地解釋為何在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些國家走得一帆風順，但有些國家卻總是走走停停、崎嶇坎坷，甚至有些國家更向後倒退，出現比原本政權更加不民主的政權型態。因此，在幾經反省、檢討之後，許多學者紛紛以另一種不同的視野及角度來分析民主化的現象，他們不僅在分析層次上做了調整，著重於“微觀的過程”分析；同時，對於政治民主化的期待也不似以往那般地樂觀、直線式的看法。

Harry Eckstein 便強調：「民主轉型並不是全球一致的過程，總是涉及相同的階級、政治

議題或相同之解決方法，相反地，不同的社會衝突及政治內容可能為政治民主相結合。」(Eckstein, 1965: 183-185)這也意謂著民主轉型有不同的過程，且到民主之路是多元化的。其次，「民主演進也不是一個穩定且具同質性，……在時間上也不是連續的。」(Rustow, 1970: 345)換言之，在轉型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上有不同的重要因素，因為民主轉型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其中允許不同團體提供走向民主之重要衝力的可能性。在這種強調過程的研究取向之下，政治行動者的角色是研究的焦點所在。

O' Donnell 與 Schmitter 將民主轉型的過程比喻為一場棋賽 (Chess)，賽局中究竟將有多少參與者並未明確限定；同時，誰是敵、友的界線相當模糊；而勝負也是個未知數，因此，參與賽局必須同時考慮其他人可能擁有的資源及所可能採取的策略，並理性地計算利弊得失之後，再做出審慎的抉擇。(O' 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66) 因此，政治轉型過程是一連串的競爭、衝突、派系競合，最後在彼此相持不下的對峙之下，願意彼此容忍的情況下將衝突解決的方式予以制度化。

Dankwart Rustow 將這種過程分為四個階段，而且這四個階段彼此環環相扣，每一階段皆存在一些特性與固有的困難。其中，最重要且最基礎的一項背景條件是“國家統一”。實際上，國家統一類同於國家認同的概念，而它之所以是重要的條件是因為政治民主是多數決政治，因此首要條件是必須先決定誰是人民，而誰不是。其次，是“預備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鬥爭、衝突、呈現極化的政治是其特質；同時，一些新的菁英也一一出現；社會上被壓抑的個人或團體也被喚醒，加入行動，在這個階段中，“極化”而非“多元化”是最大特色。在預備階段結束時，部份政治菁英大致上已準備接受“同中有異”的存在，並在最後將一些重要的民主程序面向，加以制度化。因此，這種對“同中有異”的接受及制度化的舉動皆是“有意識的、刻意的妥協”，而此時轉型過程便轉入了“決定階段”的核心。在決定階段中，少數政治菁英顯然扮演較為重要的角色“在政治領導者有意識的選擇下，經由頻繁的協商與審慎的考量，決定採取民主政治做為解決紛爭的方式。最後，由政治菁英所達成的協議，逐漸轉移到其他從政者及一般民眾之間，使得民眾也能逐漸適應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這個階段也就是“適應階段”。民主化過程至此才算大勢底定。(Rustow, 1970)

針對民主轉型過程的特質，Przeworski 認為：事實上，沒有一種途徑可以充份且精密地描繪、計算出威權體制轉化過程之本質。特別是表現在不同的團體與行動者之間聯盟關係的極度不穩定。特別困難的是，我們不只是一要了解行動者或團體的特殊利益，而且要視行動者對其他行動者行為之反應來計算各種利益之可能性，那麼所謂的策略將變得十分複雜且不穩定“所以，一個較佳的方法是將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不同策略性政治姿態做一分類：如強硬派 (hard-liner)、溫和派 (soft-liner)、基本教義派或溫和反對派。(Przeworski, 1986: 58)。

O' Donnell 與 Schmitter 的分析，同樣地也是著重於分析轉型過程中，這些派別或團體之間的競合、互動關係。在他們看來，政治民主化的動力是來自國內統治聯盟的分裂，也就是當統治聯盟分化出強硬派和溫和派的區別時，政治民主化便逐漸現露生機。但是，實際上統治聯盟之分裂、衝突或許對威權政體或獨裁者的崩潰，有關鍵性影響，不過「對於一個威權政體之崩潰而言是充要的因素，不見得對於政治民主之建立也是如此。」因此，舊政體雖然崩潰，進行轉型，但轉型的結果將會形成何種局面以及轉型期間究竟有多長，都是個未知數，於是民主轉型經常是非直線式、且具高度不確定性，甚至是可逆轉的過程。因此，建立

政治民主的過程就是一個將“不確定性”加以制度化的過程。(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65)

或許，在 O' Donnell 與 Schmitter 看來，這種制度化的過程，就是所謂「談判協定」(Negotiating Pacts)的過程。而「協定」，簡單地說就是朝野政治菁英之間的相互協議及承諾在各自重大利益之相互保證基礎上，來界定某些權力運作之規則。(O' 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37)而這種協定最重要的核心是在於訂定協議之參與者願意接受，並遵守新的遊戲規則並保障不傷害彼此的利益之承諾。就協定形成來說，這種協定是建立在彼此相持不下，沒有任何單獨一方能完全掌握全局、操縱他方的命運之情境下。因此，很明顯的，政治民主的建立絕非是某一方片面的賜予，而是經過一連串的異議、衝突、合縱連橫、協商與妥協後的產物。而這個過程充滿了太多太多的不確定性，隨時皆可能有人起而反對，於是民主轉型中所訂之協定是相當脆弱的，隨時都會有倒退的危機，所以，Przeworski 說：「如果和平的轉型要成爲可能，那麼它首先要解決的一個難題是如何將不確定加以制度化，而又不威脅到那些有能力終止這種轉型的人的利益。」(Przeworski, 1986: 60)

臺灣的民主轉型過程與拉丁美洲或南歐一些國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轉型過程是平和、漸進的轉型，並未出現政權崩潰的現象。若以學者 Share 與 Mainwaring 對民主轉型所作三種理想類型的分類來看，臺灣的轉型型態應該是屬於第三種——「協商的轉型」(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這種轉型的大部分面向都是由威權政體的精英發起，並加以控制，而大眾動員、外交壓力及國內反對勢力，是塑造民主化過程的第二層重要因素。(Share and Mainwaring, 1986: 178-179)

政治精英間策略性的互動關係對臺灣民主轉型的推進，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對於轉型過程中精英之間的互動以及精英所扮演的角色的描述與分析，目前已有學者做過相當精緻的描繪，例如：Cheng and Haggard (1992) 和游盈隆 (1993)，礙於篇幅所限，本文將不再贅述。然而，在有關民主轉型過程的分析上，學者之間多數會對這樣的一個問題感到興趣，並試圖提出他們的看法，這個問題就是：民主轉型或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動力是來自威權體制中的統治集團或是來自民間社會的人民在意識覺醒後，迫使執政當局進行不得不然的改革與開放？換一種簡單的問法就是：民主改革是威權政權「由上而下」的主導或是「由下而上」的壓力使然？針對這樣的問題，不同的學者曾提出不同的看法，在此，我們實無意加入這樣的一場爭辯，不過我們也願意提出一個頗值得思考的因素，來解釋國民黨爲何願意開放政權，進行政治民主化，而這項變數正是來自國民黨本身的意識型態上。

眾所皆知，「三民主義」一直是國民黨奉爲圭臬的一種主義或治國方針，國民黨也常以臺灣是「三民主義」施行的模範省，而感到自豪。「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實際上就是民主主義，「民權主義」的目標，也就是在建立民主政治，「以建民國」就是要建立一個以「主權在民」爲立國精神之民主國家。雖然，國民黨自治台以來，在統治型態上維持一種以「威權體制」，限制人民參與中央政府的權利，同時，也限制人民的集會結社權利，但是爲了維繫自我的意識形態，國民黨除了不斷透過政治社會化的管道，例如學校教育、傳播媒體，傳播民主的觀念；另一方面，自 1950 年開始，國民黨陸續開辦地方自治，舉辦地方選舉。雖然，在當時只限於有限開放的參與，並且具有濃厚的「訓政」色彩與心態，但是，如果沒有這種地方基層選舉的陸續舉辦，何來所謂的本土政治精英和黨外的出現呢？而且選舉的項

目和範圍陸續延伸、最後擴大到中央層級。因此，如果我們也接受反對黨或反對勢力對臺灣民主轉型有難以磨滅的貢獻，那麼對於促使反對勢力得以成長茁壯的地方性基層選舉的貢獻，也不能不予以肯定。當然，除了國民黨意識型態的推動力外，反對黨或反對勢力，在轉型過程中所提供的壓力或推力，當然也應予以肯定。而且，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個人決定，也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因此，目前任何單一因素的解釋都可能只具有片面的意義，過於堅持特定因素的決定性力量或將政治民主化完全歸功於某單一因素，都難免流於武斷與偏頗，而且失之客觀。

綜觀 Rustow 的分析，相當清楚的一點是他強調了政治面向的動態與決定力，而主要的行動者是政治菁英的角色與彼此的互動模式。在 Rustow 看來「民主政治是透過至少一部份主要政治領袖有意識的決定過程而獲得的。」(Rustow, 1970: 356) 然而，Rustow 的分析似乎忽略了非政治性因素可能有的影響力。雖然 Rustow 也曾強調說：「民主起源理論中須假定一種“雙向因果關係”(a two-way flow of causality) 或某些循環互動的型式。」(Rustow, 1970: 3-44) 但是究竟這種政治與非政治之經、社及文化因素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是如何進行呢？它們又將如何影響政治民主化的推展？Rustow 對這些問題並未提出進一步的說明及分析，因而使得他的論證太著重於過程事實之描述而顯得有些單調。其次，Rustow 將整個民主化的過程分成四個階段的分析架構也有些問題：因為並非每個歷史發展皆可能或必須要按照四段邏輯而演進；同時，某一個階段的跳躍或未能完成，並不必然會限制了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例如：Rustow 強調的“國家統一”是政治民主化之唯一先決條件，但這項先決條件在台灣仍是一個未被充份解決的爭議議題，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仍有相當的斬獲。雖然，國家認同問題也曾與民主化問題糾結在一起而阻礙了民主化的推展，但民主化的推進不僅在邏輯上可能，且事實上也發生了。因此，Rustow 的階段論太過於侷限於某些條件之滿足，因而導致其分析架構過於僵硬而無法處理非按照四階段邏輯發展的民主化現象。

實際上，O' Donnell 與 Schmitter 的觀點相當程度是受到 Dankward Rustow 的影響，大抵皆強調著重於政治過程的描述與分析，同時焦點也都集中在政治菁英的策略抉擇，政治計算與互動關係，而對於民主建立的解釋上，則強調衝突、妥協的動態和諧模式。然而，他們之間的不同處在於 O' Donnell 與 Schmitter 並無意建立一套分析模式或理論，而只是著重於對個案進行深刻而細緻的分析與描述，因此自然沒有 Rustow 分析架構的粗糙與不足，但也因此使得這種研究只能針對不同的個案進行分析，無法歸納出一般性的通則，因此理論性不高，嚴格說來並不能稱得上是理論。其次，過份強調政治菁英的角色，忽略了政治菁英如何與大眾社會連結的問題。Daniel H. Levine 認為：「他們較關注於轉型而較少涉及威權主義或民主。……而一般的老百姓也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好像自始至終都沒有牽涉到，而只是單純的等待轉型的完成，事實上並非如此；同時，他們也忽略了領導者與社會大眾的聯繫。」(Levin, 1988: 388-389)

五、政治轉型的結果

任何的政權轉型必然都有終止的一刻。而政治轉型的結果，可能是民主政權的來臨，當然也可能出現比原先的政權更不民主的政權型態。然而，在這裡我們關懷的焦點將只限於前

者，也就是對民主轉型的結果做相關理論上的檢閱與探討。眾所皆知，民主轉型的結果，自然指的就是「將民主規則加以制度化」。(Ethier, 1990: 5) 換言之，制度化民主的遊戲規則也就是在進行鞏固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促使民主體系能夠持續與穩定，因此探討民主轉型的結果，相當程度也是在對轉型後的民主政權是否能鞏固或維持穩定，進行因果分析。

對於穩定民主的理論探討，大致上，學者關懷的焦點主要是在探求維持穩定民主，應具備那些先決條件，如果我們能接受下述這樣的觀點：民主的出現幾乎是排他性的建立在政治因素(也就是指不同階級或社會團體之間的權力鬥爭或平衡)因此，引發社會共識發展的經、社以及文化轉變，只能被認為是「民主協定」(democratic pact)的結果或民主鞏固的條件。(Ethier, 1990: 13)那麼，這些一直被接受為引發民主轉型的經、社、文化因素，也應該將之視為左右穩定民主的一些關鍵性變數或有利條件來加以探討。

首先，從經、社因素來說，就如同本文在轉型原因的探討中所介紹的學者以及觀點一般，大致上的論點可以簡單的描述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情況越好，就越能維持民主。Lipset 運用不同的指標來驗證這項假設，結果發現：一國的平均所得、工業化、都市化以及教育水準的程度越高，這個國家就越民主。(Lipset, 1960: 31-45) 隨著經濟的發展會帶動「社會動員」在 Deutsch 的觀點中認為：「社會動員」是舊有的社會、經濟、心理的瓦解；同時，也是人們開始接受新的行為模式的社會化過程。它是由高教育和識字率、大眾傳播普及以及工業化、都市化所帶來的結果。(Deutsch, 1961: 494)它意謂著人們的態度、價值及期望，由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變。政治現代化最基本的觀念或現代化過程對政治上的影響主要的是個人和團體對政治參與的增加；同時，隨著生活水準及教育程度的提昇，民眾的政治態度會變得較溫和、理性，對於民主政治的穩定，自然有利。

但是，對於「經、社發展有利於穩定民主」這樣樂觀的命題，Huntington 並不以為然。在他所著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1968)一書中，即非常強調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維持政治穩定。Huntington 發現：在現代的拉丁美洲國家中，較富有的國家比貧窮國家來得不穩定，在現代化國家中，暴力、不安和極端主義，通常都發生在都市及工業中心，不僅是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會造成政治的不穩定，同時不穩定的程度和現代化的程度也有關連。現代化的程度越高，政治上的不穩定越大，都市化、教育普及、大眾傳播的發達，這些都帶給人民較高的期望，這些期望如果沒有被滿足，便會使得人民朝政治管道去爭取，在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制度下，這種參與的增加，將會導致政治的不穩定與暴力的產生。(Huntington, 1968: 17-29) 因此，基本上 Huntington 強調的是高度的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穩定的先決條件。

再者，以文化因素與民主穩定之間的關係為研究的關懷中心，Almond 和 Verba 也提出他們的觀點。對於 Almond 和 Verba 的「公民文化」對民主穩定所具有的正面作用與價值，前文曾做過介紹，在這裡我們將簡略的再予以回顧。基本上，Almond 和 Verba 試圖從五個民主國家的經驗研究中發現一種適合民主政治體系的政治態度模式，而這種政治態度將培育出穩定的民主。經過研究發現，從英、美兩個較為相對穩定及成功的民主國家中，歸納出一種不同於古典規範性民主理論所強調的「理性—積極主義」(rationality—activist)的「公民文化」。原則上，Almond 和 Verba 的結論是：「公民文化」相當適合一個穩定及有效之民主政治過程的維持。這種公民文化是一種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有許多人對政治

非常積極，但一也有為數不少的人，扮演一種消極的臣屬角色。換言之，「參與型」、「臣屬型」以及「地域型」(Parochial)的角色，同時並存，這種矛盾的混合，在 Almond 和 Verba 看來，似乎是特別適合民主的政治體系。(Almond and Verba, 1963: 473-493)

以價值與穩定民主為主題，Lipset 在「政治人」(Political Man, 1960)一書中，開宗明義即表明：政治社會學主要的關懷，就是在分析建構民主政治的社會要件。雖然，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是某種程度的衝突或分歧，以便競爭統治地位，挑戰執政黨以及執政的輪替，但是衝突必須節之以共識或競爭者普遍的同意，否則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因此，研究民主政治穩定的條件，就必須從分歧與共識著手。(Lipset, 1960: 21)從另一個角度來看，Lipset 認為：任何一個民主政治要能穩定，不僅有賴於經濟發展，而且，尚需要政治體系的「合法性」(legitimacy)與「有效性」(effectiveness)。在經驗上，穩定的民主體系，例如：美、英、瑞士等國，在這兩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的程度。換言之，為使政治體系的穩定，避免面臨危機，因此體系必須具有解決社會上政治衝突的能力，否則體系長期的無能，終將引發合法性的喪失，造成體系的危機。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現存制度或形式是最適合社會」的這種信仰，政治體系就必須充份展現出「現行制度是解決衝突的可行方式」。(Lipset, 1960: 77-92)

另外，也有學者從政治精英與民主穩定或民主鞏固之間的關係出發，探討精英之間的「協定」(settlement)對民主鞏固的重要性。John Higley 和 Richard Gunther 認為：精英之間如果能對民主的程序以及制度，產生一定的共識，那民主鞏固將更形穩定。Higley 和 Gunther 首先對何謂「民主鞏固」提出他們的界說：民主鞏固應被視為民主結構與規範的調適或定型，同時這些結構與規範能被部份或全部的民間社會接受他們的合法性的一種過程。以兩項分類指標——所有重要精英或派系對於政治行為規則與典則以及政治制度的價值分享共識，同時他們也享有結構上一致性的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網絡，而能以和平方式影響決策並保護與促進派系的利益，而擴大群眾在選舉以及其他制度過程中的參與，以建構出程序民主。(Higley, Gunther, and Burton, 1992: 1-35)

現代民主理論大師 Robert A. Dahl 曾在他的著名作品「多元政體——參與和反對」(Polyarch: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1971)一書中，提出一個與精英協定相類似的概念，即「相互安全感」(mutual security)。Dahl 認為：一個國家的民主能否穩定與該國民主發展的歷史經驗，尤其是變遷順序，有密切相關。Dahl 在書中歸結出三種過渡到「多元政體」的政權變遷途徑，而變遷的內涵是沿著兩個面向——公開競爭(政治自由化)以及擴大參與(政治民主化)。這三種變遷的路徑分別是：1.開放競爭先於擴大參與；2.先擴大人民的參與層面，然後再開放競爭；3.開放競爭與參與擴大的同時並進。

從歷史經驗中，大致上也都能找出符合這三種政體變遷路徑的國家。從這些國家的歷史發展經驗中，Dahl 發現：具有較悠久以及穩定的多元政治國家中，最常見的順序是在擴大政治參與之前，先開放政治競爭，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第一條途徑。Dahl 進一步解釋採取先開放競爭，但限制大眾參與的策略之所以能使民主穩定的原因，主要是這樣比較能發展出「容忍」以及「相互間的安全感」。因為在人數相對少於大眾的精英之間，要發展出競爭性的政治規範與慣例，比較容易，同時在人數有限的少數精英或貴族團體中，往往充斥著朋友、家族、派系、階級與意識型態的重疊和連結關係，因而抑制了衝突的嚴重性；反之，要

在人數眾多的大眾之間建立起這種容忍精神，往往比較困難，所以採取先開放政治競爭的途徑，較有可能建立穩定的公開競爭政權所需的「相安制度」。

但是，什麼樣的條件有助於政權願意開放政治競爭，以使穩定的「多元政治」得以建立與實施呢？Dahl 利用人類本能的一種「預期心理」，提出三項他認為有助於政府與反對勢力建立雙方安全感的假設：1.當預期的容忍成本下降時，政府就比較可能容忍反對勢力；2.當預期的壓制成本上升時，政府就傾向於容忍反對勢力；3.當壓制成本高過容忍成本越多時，競爭性政權出現的機會就越大。

如果說，政府預期鎮壓反對勢力的成本高於容忍的成本，是競爭性政權建立的先決要件的話，那麼如何維持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之間的平衡或是一種誰也不能毀滅對方的「相互安全感」的形成，將同時引發民主能否持續的疑慮。從這個角度出發，Dahl 將視野擴展到政治領域以外，涵蓋歷史、社會、經濟以及政治文化的資源分配或相關變數上，Dahl 提出七項助長「多元政體」的條件，它們分別是：

- 一、歷史發展過程應該是競爭先於參與（包容）。
- 二、社會經濟秩序應該是保持分散或中立，經濟型態應該是分散控制；
- 三、經濟發展程度應該保持高度發展，國民生產毛額每人超過 \$ 700~800(1957 年時)；
- 四、不平等的情況差距小且分散，同時相對剝奪感相當低；
- 五、次級文化多元化在數量上應盡量減少或者應盡量使得區域性團體減少，並使任何團體都能接近政府；
- 六、輕度或暫時性的受到外國勢力所控制；
- 七、政治積極份子之間應共同信仰「多元政治」以及單一權威的合法性；同時，高度信任他人，在政治上維持既競爭、也合作的關係，並相信妥協是必要、也是可欲的。(Dahl, 1971)

六、民主鞏固的變數

除了經、社、文化因素的考慮外，政治變數與民主鞏固關係的重要性，也開始受到重視。政治變數除了上述所討論有關政治行動者或政治精英之間策略性互動以及共識的形成之外，制度面項的考量亦是不容忽視的層次，制度層面的考慮主要是包括對政府體制的型態以及選舉制度兩個層次的選擇問題。在臺灣民主轉型過程中，上述這兩項根本的制度選擇的問題，至今仍引發相當的爭論。

對於政府體制的討論主要是在企圖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哪一種政府體制的安排——總統制、內閣制或半總統制（或稱雙重行政首長制）——比較有助於新興國家民主政治的效能及穩定運作？對於民主穩定性的制度面項考慮的先鋒著作是 Alfred Stepan 和 Juan J. Linz 合著的「民主政權的崩潰」(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1975) 叢書，該作品強調政治變項、領導、抉擇以及制度脈絡與正式的法規在解釋民主失敗的重要性；雖然，作者未能清楚的回答政權型態和民主崩潰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對於政府體制與民主穩定之間關係有過系統性對話與探討的作品要以 Linz、Seymour Martin Lipset 及 Donald L. Horowitz 在一本政治學術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0) 所進行的論戰為代表。隨後，Arend Lijphart 更將這些作品與其他學者的相關文獻加以彙集，編成一本專門探討政府體制型態的專書「總

統制對議會制」(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1992)。這些文獻相當程度地提供了各種不同角度的分析與思考理路來解構各種政府體制的優劣之處，足以為企圖在制度變數與民主鞏固之間找尋可能存在之關係的研究者，提供相當廣闊的聯想空間與充份的立論根據。

在這場挑戰與回應的論戰中，Linz 對總統制可能出現的缺失一一提出質疑並直言「內閣制民主在歷史上的優越表現，並非偶然，考慮各種結果並仔細的比較內閣制與總統制後將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前者比後者更能促進穩定的民主，這個結論特別適用於那些具有深刻政治分歧和多黨制的國家，因為像這樣的國家，內閣制通常能提供維持民主較好的希望」。(Linz, 1990: 52) Linz 對於總統制的質疑與詰難，大致可歸結成以下幾點：

1. 由於總統與議會皆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權力來源均為人民，因此，易發生「雙元民主正當性」的危機，尤其，當總統與議會多數黨分屬不同黨籍所掌握時，誰較能強烈地宣稱代表人民呢？對於這類的民主原則衝突情況，憲法並未提供有效解決的機制，因此，毫無例外地，在過去所發生的這些情形，軍人干預便成爲一種調和的力量。此外，這種「雙元民主正當性」問題也發生在一些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因為總統與國會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政治社會基層意見與見解，可能使受到議會反對的總統試圖動員人民來對抗鄉村寡頭、貴族或特殊利益，宣稱自己是唯一真正具有民主正當性，或者，利用傳統地區的支持者來對抗社會中較都市或現代的部門，因此，制度上的緊張也許最後演變成必須在街頭中尋找答案。
2. 總統任期固定一方面使得政治過程因任期的限制而產生不連續的弊端，隨著總統的任期而分成不同的時期；總統在任期固定的壓力下，也容易使得政策品質出現許多瑕疵。反之，當總統在預知無法進行連任時，施政品質也容易因連任壓力的消失而便直行事；另一方面則造成無法使明顯不勝任者在任期期間下臺，形成一種制度上的僵硬設計。
3. 總統兼具國家元首與最高行政首長兩種不相容的身分，因此，如何同時扮演好這兩種角色並將可能的衝突減至最低，有其實踐上的困難。
4. 總統的選舉方式容易出現「勝者全得」(winner-take-all) 的「零和」(zero-sum) 結果，在多黨競爭總統職位的情況下爲了獲勝，往往會形成兩個聯盟的競爭，這種選舉的結盟往往會造成極端政黨獲得過度的影響力。換言之，除非在政治光譜的中間出現一位強有力的候選人能夠吸收廣泛的支持以對抗極端者，否則，總統選舉可能會造成選民的割裂與分化。
5. 副總統的繼任制度也會產生問題，在總統與副總統不是搭配競選，而是採取分別選舉產生的情況下，一旦分別由不同政黨所當選，在總統因故無法視事而由副總統繼任時，支持前任總統的人也許會反對繼任者，指稱其缺乏民主正當性，換言之，總統制並不保證全國選民或政治領袖將支持副總統來發揮他們賦予前任總統的權力。
6. 民主的恢復無疑地將持續地需要一些協商策略，例如：大聯盟的形成以及訂定協定，而總統制的缺點就在將這種策略給僵化及形式化了。(Linz, 1990: 51~69; 1994: 3~90)

另一位比較政治學者 Arend Lijphart 也從如何促使民主穩定運作的角度對總統制提出批

判。在一篇收錄在 Linz 編纂的「總統制的失敗」(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1994) 一書中的文章「總統制與多數決民主：理論上的觀察」(Presidentialism and Majoritarian Democracy: 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Lijphart 認為「總統制的另一項缺點是它強烈傾向「多數決民主」尤其是在亟需以「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 取代「多數決民主」的國家, 這項缺點更是強烈, 因為, 總統制難與以「聯合內閣制」、「多黨體系」、「多面向議題的政黨體系」以及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式為主要特徵的「共識民主」相容。(Lijphart, 1994: 91~105)

Alfred Stepan 與 Cindy Skach 更是透過一些經驗數字資料的整理分析來支持一項論點：「議會民主將傾向增加新興民主國家在當他們試圖進行鞏固民主之同時, 有助於對所面臨之經濟、社會重建之重大工程的自由程度」。實際上, Stepan 與 Skach 並不在評估總統制及議會制的優缺點, 主要是在於透過分析數筆不同來源的資料, 以支持民主鞏固與純粹議會制之間的相關, 強於民主鞏固與總統制的論點。Stepan 與 Skach 的研究發現議會民主的存活力高於總統民主有三倍之多, 而總統民主經歷軍事政變的可能性是議會制的兩倍, 同時, 總統制下的部長比議會制下的內閣成員來得缺乏經驗。

Stepan 與 Skach 認為：純粹議會制的本質是相互依賴, 從這個條件中我們可以預測出一系列的誘因及決策規則來建立與維持單一或聯盟多數、減少國會的僵局、避免行政蔑視憲法並阻止政治社會支持軍事政變一等；而純粹總統制的本質是相互獨立, 因此, 我們可以預測出一系列的誘因及決策規則以鼓勵少數政府的出現、阻礙持久性聯盟的出現、增加國會的僵局、給與行政蔑視憲法的動機並刺激政治社會定期要求政變。同時, 國會與總統之間又無打開僵局的方法, 於是為了推行重大的政策, 總統可能不得不遊走憲法邊緣, 以命令來進行統治, 因此, 許多新興國家為了獲得一個強勢的行政而選擇總統制似乎是相當矛盾的。當這個國家發生經、社危機時, 總統制國家較可能發覺自己正處於「統治危機」, 同時, 在轉變成「政權危機」之前, 也較難將危機解除。這種情況通常會導致總統與其反對者雙雙尋求軍隊介入解決危機, 以使自己得利。

在議會制下, 透過議會多數要求政府重組, 能避免少數政府以命令統治(decree-law) 的危險, 同時, 在議會制下, 除非是在議會中「至少是受到支持的少數」, 否則, 政府無法組成, 以及一旦失去議會信任時, 可以簡單的不信任投票使政府下臺, 這兩項機制都將有助於「政府危機」在轉變成「政權危機」之前將之化解, 因而減少訴諸軍隊介入的誘因。(Stepan & Skach, 1994: 119~138)

對於 Linz 對總統制的所提出的詰難, Horowitz 與 Lipset 分別提出不同的看法, 試圖為總統制作辯護。Horowitz 的反應大致如下：

- 1.Linz 的論證是建基在地域上的扭曲及具有高度選擇性之比較經驗的實例上。Linz 從拉丁美洲的巴西、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及智利等國的經驗證明總統制造成不穩定, 但是如果他將焦點放在後殖民地的亞洲與非洲的不穩定, 制度上的罪人一定是議會制。
- 2.Linz 是以機械論, 甚至嘲諷的觀點來看總統制, 認為總統制是一個僵化的制度, 有利於零和政治的出現。但這種現象也並非絕對如此。在總統制下, 政府與反對派也可能在立法的過程中合作, 美國的總統制在這方面便是一個顯例。同時, 既然總統制容易造成總統與國會分別由不同多數所掌握而形成行政與立法的僵局, 那麼又如何出現全

得的結果呢？因此，我們又如何能同時抱怨「部門間的制衡」(inter branch checks and balances)及「勝者全得」呢？

- 3.雖然，理論上要使議會政府下臺確實比要總統下臺來得容易，但除非是因社會存在割裂現象政府由不穩定的聯盟所組成，否則一樣難使議會政府下臺。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是一個相當好的理由採取總統制，透過可以培育出調和及建立共識的選舉制度來支撐，法國第五共和(1958)所建立起的總統制就是一項最佳的詮釋。
- 4.在總統選舉的制度方面，Linz的批評主要的中心假定是：總統選舉方式不是採用「相對多數」，就是「絕對多數」。但是，例如奈及利亞以及斯里蘭卡這兩個國家都存在著社會分歧嚴重的現象，他們都能透過小心設計的總統選舉安排，而將極端份子排除在當選的可能性之外，提供了溫和化的誘因並促進分歧社會的妥協。(Horowitz, 1990: 73~79)

Lipset 以「政治文化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為題，呼籲應重視經濟、文化因素對於民主鞏固的影響，雖然源自不同歷史的文化因素特別難以操縱，而政治制度較容易改變，但是，也不應只重視政治制度變數的探討，畢竟除了法國第五共和以及西德施加在小黨代表身上的障礙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證據能證明這種政治制度變數探討的努力是有效的，更何況西德的例子仍是有待爭辯的。(Lipset, 1990: 80~84)

實際上，世界各國的政府體制安排並不盡然完全按照這兩種體制的的基本特徵來組成，介於這兩種近乎理想類型的制度安排中間，還存在著類似總統制或內閣制的各種混合制，其中最受政界及學界所廣泛討論的莫過於以法國第五共和為典範的「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 system)或稱為「雙重行政首長制」(bipolar executive system)。(Duverger, 1992)

半總統制與民主穩定之間的討論似乎在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成為矚目的焦點。Giovanni Sartori 在「既非總統制，亦非內閣制」(Neither Presidentialism Nor Parliamentarism)一文中，同時針對總統制與內閣制，提出批判，間接地為半總統制進行鼓吹工作。

Sartori 認為就採取總統制的美國而言，即使美國長期以來能應付它所面臨的問題，但這個事實並不能減低權力分立結構比其他制度更易引發癱瘓及停滯的事實。過去是因權力分立結構已被行政與立法為一致的多數黨掌握或兩黨協商(例如：兩黨在某些外交政策上達成一致)所緩和，一旦這種一致的多數不再時，總統制能否提供有效率政府，答案將是否定的；其次，美國的總統制能運作順暢，尚得力於三項因素：一、務實彈性的意識型態；二、軟弱且無紀律的政黨；三、地方中心的政治。在這三項基礎上，總統要獲得國會的支持便需要用選區利益作交換，結果出現的是一個沒什麼值得讓人欽羨的「肉桶政治」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rkbarrel politics)

另一方面，從選舉制度、政黨體系以及政治文化或極化程度的層面來看，以英國的議會制為例，它假定了單一政黨政府，其中也預設了傾向出現兩黨制的單一選區制度，但是，當政治體系是一個極化或存在異質性的政治文化時，這種「勝者全得」的制度，便不可取了，在這種情況下，惟有比例代表制及聯盟式的政治才是根本的安全之道。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的議會制下，嚴格的黨紀是必須的，這使我們對於許多缺乏這種條件，又決定將總統制改成議會制的拉丁美洲國家(例如：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的未來表現，感到懷疑。

至於類似美國總統制的行政、立法分別由不同的多數所控制的情形，在法國的半總統制可能出現，但，因法國不像美國是建立在權力分立的基礎上，因此，這種類比並不十分恰當，不過，即使出現，半總統制的優點正好是它能應付這種分裂的多數，也就是說，這將削弱總統，迫使總統與不同黨的總理進行共治，進而產生能尋求支持政府之聯盟多數的強勢總理。因此，半總統制能化解純粹總統制所無法解決的難題。(Sartori, 1994: 106~118)

Linz 也對這種半總統制的制度設計提出一些不同的觀點，Linz 認為政黨體系往往可以決定憲政體制運作的成功與否，最樂觀的情形是總統是議會中多數黨的黨領導人。換言之，只要在總統對他所屬的政黨有相當大影響力以及就算不存在這種影響力，但政黨體系結構能夠產生足以支持政府的議會，那麼雙重行政首長制也能運作下去。反之，在一種極端多黨制以及政黨分化的情況下，如果總統是某一主要政黨的領袖，或許他仍能運用他的地位，促使政黨與他黨進行合作，使得政府得以穩定，不過，在這種情形下，他可能須與總理進行共治。但是，當總統對於自己所屬政黨以及其他任何政黨都無影響力，同時，他又必須支持他所不同意的政策時，局面將更為窘困。即使能夠透過解散議會的方法來尋求解決，但如果選民投票結果仍支持原本的總理時，問題依舊是無法解決，在這種情形下，或許總統將被迫辭職或放棄權力。因此，一位具有相當權力的總統和一個無法接受他的議會多數二者之間的無法相容性是可能引發嚴重的僵局，而導致政治體系出現危機。

其次，一般皆認為雙重行政首長制的優點是能容許總統更換總理以及政策而不致引發體系危機或是執政黨內部的危機，例如密特朗將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 的政策由干預主義轉變成較自由的政策方向。但是，這種說法並不盡然如此，因為，它必將無法促使負責任以及凝聚力強的政黨出現，同時，總統與總理的施政理念不同時，將導致二人在政策上的爭論。再者，內閣部長也可能繞過總理直接與總統接觸，促使總統否決掉總理的決定，於是總統與總理之間的鬥爭結果將是決策的拖延以及矛盾的政策，例如：密特朗總統下的法國經驗，便顯示出這種體制並不能保證效率的最大化。

最後，雙重行政首長制一項值得注意的憲法上以及政治上的問題是：軍隊的權威歸屬的問題。在總統制下，毫無疑問地，總統是軍隊的領袖；在純粹的議會制下，國防部長的任免權掌握在首相手中，但在雙重行政首長制中，軍事決策上卻可能有至少三個甚至有四個主要角色：總統、總理、國防部長以及參謀總長。在層層的官僚體制下，總統需要透過國防部長才能有所行動？或者國防部長能繞過總理直接與總統建立聯繫、直接向總統報告？當總統、總理、國防部長與參謀總長之間存有政治或黨派衝突時，這種體制便存在著潛在的政治或憲政危機，導致軍隊可以在兩個同時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權威之間進行選擇，因此，雙重行政首長制存在著一種有關「軍隊臣服於民主選舉的權威以及文人至上」的憲法模糊。

因此，雙重行政首長制也許能夠運作，但不必然會是在提倡者的原意之下。當它變成議會制時，例如：愛爾蘭、冰島、第二共和時期的奧地利，或者當支持總統的政黨與支持總理的多數是一致的時候以及當總統深深了解到他必須允許受到議會多數支持的總理發揮權力時，雙重行政首長制才能運作，但無論如何，在克服極端或分化的政黨體系時，它可能不是一個有效率的政府，除非它能結合許多其他重要的情境，否則它將無法克服政黨體系的殘弱性。(Linz, 1994: 48-60)

至於那一種選舉制度可能是最有利於新興民主的穩定呢？相信這個問題對於新興國家

的民主發展是相當重要的核心問題，然而，遺憾的是，它也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至少目前的學術研究，仍難有一致的論點。在邏輯上，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最直接的反應是表現在政黨體系的層次上，然後，再投射到政府的形成以及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最後呈現出來的才是民主政治的穩定或不穩定，換言之，選舉制度是透過政黨體系、政府型態才與民主穩定建立起間接關係，因此，這種關係的建立可能必須考慮好幾種不同的變數組合以及變數間的關係，才能確定。在這裡我們無法將這些變數的各種關係一一予以探討（在這方面的探討可參見 Rae, 1971；Lijphart & Grofman, 1986；吳文程，1994），我們提出這項變數的目的除了考慮到選舉制度與前述所討論的政府型態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外，主要是有鑑於在民主化過程中，當民主的選舉程序已被廣泛接受為政權轉移的唯一手段時，如何選擇一種可能為各界所接受的選舉制度，實攸關民主能否進一步達成鞏固的關鍵，因此，與政府體制一樣，選舉制度的選擇也是民主鞏固過程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環視台灣後民主化的鞏固過程，憲政體制的定位及修憲過程也曾經歷過無數的爭執與辯論，這其中也包括對總統選舉制度抉擇的爭論。雖然已陸續進行三次的修憲，不過，結果不僅無法令朝野各界滿意，更造成臺灣的政府體制在定位上日漸模糊，雖然在大致上隱約中可看出似乎有朝著類似法國第五共和的半總統制方向修改。姑且不論以法國半總統制為仿效對象是否適當，但就目前一些與憲政運作的穩定性以及可預測性密切相關的制度設計（例如：與內閣能避免出現短命內閣有關的立委任期應與總統國大一致化的條款）至今尚未能加以確定、落實，這對臺灣未來的憲政民主能否鞏固，無疑地將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議題，這種影響將在今、明年（1995、1996）的立委及總統的選舉結果中得到驗證。除了迫在眉睫的憲政議題外，在民主鞏固的過程中，可預見的，臺灣將面臨的其他潛伏性的重大議題包括：省籍衝突以及地域意識。臺灣最近幾年的中國結、臺灣結、二二八情結以及臺獨情結，如果進一步惡化，最後造成軍方領袖、政府上層文官以及外省第二代的嚴重危機感，就絕非民主之福了。（周陽山，1990：201）其次，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主化過程中，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覺醒是相當明顯的一股民主化勢力，尤其在威權統治剛鬆動時，反對黨充份與民間社會中的社會運動相互支援的經驗已促使民間社會的活動者逐漸進入政治社會，提出資源重新分配的種種議題與要求。剛開始這些民間團體的力量是加速威權統治轉型的動力之一，但是，過度動員的結果卻造成社會運動氾濫，甚至在進行街頭示威、抗議活動時，遊走法令邊緣，強調透過人民的力量的展現直接決定政治社會的運作方向，因此，「民粹主義」（populism）的政治似乎開始在支配臺灣的政治走向。又如提倡透過公民投票來解決重大政策問題，包括臺灣的前途；總統由公民直選的倡議以及在選戰中高呼市民主義、市民投票…等的訴求，實際上都部份隱含著欲以直接民主來取代代議民主的政治運作模式。這種草根型或民粹型的社會運動（周陽山，1990：222）以及直接民主的訴求，都將對國家的權威、自主性以及代議民主的運作產生直接的挑戰與衝擊。這些議題的救平與解決，也是臺灣在民主鞏固過程中，將面臨的艱巨任務與挑戰。當然統獨的爭議以及中共的威脅也是臺灣民主鞏固不確定的變數之一，不過這就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在此無法進一步加以探討。

七、結語

綜觀上述與政權轉型或民主轉型相關的理論，大致上所涉及的面向，涵蓋了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等變數。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比較政治學的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之間的關係，密切到使我們無法忽略掉任何一項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或變數，對比較政治學的視野擴展，所可能產生的刺激與啟發作用。同樣地，將我們的思考拉回到現實社會的現象中，我們也無法硬生生的將政治生活抽離出其他的生活活動空間，而能單獨發生或存在。隱藏在政治活動或政治現象表面下的許多潛在因素或動力，往往已非某一項單一因素或理論，就能完全加以解釋的，因此當我們欣喜於政治理論的多元化與科際整合而興奮地拿這些理論來解釋或預測我們感興趣的現象（例如：臺灣的民主轉型），這種單一變數或理論的局限性，往往使我們的無力感，變得愈加強烈。尤其，在本文所企圖解釋的臺灣民主轉型個案中，我們深刻體會出很難只從某一項理論或變項，就能完全掌握臺灣民主化的原因或結果。現今從各種不同角度與觀點，剖析民主轉型的文獻理論，絕大部份對臺灣個案的解釋，多少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啟發性，不過，整體而言，這些民主化的相關理論最大的共通點就是：它們都只能就整個民主化的某一部份，提出解釋或分析。就如本文曾介紹過的理論，從分析途徑來看，可區別出兩種觀點，這兩種觀點所著重的焦點並不同，每一種分析途徑所強調的變項也各有差異，例如強調先決條件的 Lipset 強調經濟發展對民主政治的貢獻；Deut-sch 則認為經濟發展所引發的社會動員是導致民主政治的重要過程；而 Almond 與 Verba 則認為一國人民政治態度文化取向，才是導致政治民主得以落地生根的基礎。這些理論或作者所觀察的變項，大抵上是可以將之視為一國走向政治民主的有利條件。但光從這些有利條件的出現，實在無法使人真正理解它們究竟是如何與民主化建立起因果關係？因此，這些先決條件觀也只能提供一些民主化較可能發生的情境脈絡或可供觀察的變項而已。

另一方面，Rustow、O' Donnell 和 Schmitter 以及 Przeworski 等人所運用的「過程分析途徑」則著重於分析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政治行動者或精英之間的策略與互動（包括衝突、談判、妥協，終至將許多不確定加以制度化的過程）。雖然，這種分析途徑將民主政治建立起的那段關鍵過程清楚地加以分析與描述，使我們能清楚地掌握建立民主政治難以避免的衝突與妥協本質，但這種分析實際上卻未能將結構性因素對政治行動者所形成的制約與限制予以同等的考慮，因此，「過程途徑」只能提供短期的動態分析。至於對於民主鞏固或民主穩定的分析，由於民主化與民主鞏固都是一種演化的過程，二者之間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分水嶺（雖然，在學術上我們可以建立起這樣一個分水嶺），因此，民主化與民主鞏固實際上存在某些重疊的過程；換言之，我們可以說有利於民主建立的條件，也可能對民主鞏固有所助益，於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長期結構因素，對於民主化原因以及民主穩定或民主鞏固的探討，是可相通的。

然而，在實證上，廣義的民主轉型是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這種轉型完整地包括：轉型前的社會歷史情境、轉型過程以及轉型結果。因此，針對某個案進行學術性分析時，也就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包括轉型原因、過程及結果的分析架構。可惜的是，目前的民主轉型理論並未能滿足這樣的需求，這是學界目前急需努力的方向，而本文也只能算是一篇針對這種需要所做的試探性的理論分析架構的建構而已。

但，另一方面，如果說，理論的「簡約原則」是評估一項理論的重要標準的話，很顯然地，對於牽涉層面相當廣泛的民主轉型現象，似乎很難建構出符合這項標準的轉型理論，至

少目前我們所熟知的民主轉型相關理論中，並未出現這樣子的作品。當然，我們並不是否認這些以經、社、文化以及政治變項出發，來建構轉型理論的努力以及它們在解釋上的部份能力與價值，本文的主要用意除了是想提供一些較相關並能解釋臺灣轉型現象之理論分析架構外，另一項企圖就是，明白地凸顯單一理論或因素對臺灣個案在解釋能力上的局限性，藉以提醒社會科學研究者，應在理論與實際之間保持一點平衡，以免過於受到理論的牽引，而喪失掉反省和批判理論的意識及能力。

參考書目

- 王振寰 1989，「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春季號），pp.71~116。
- 田弘茂 1989，《大轉型—中華民國政治與社會變遷》，李晴暉與，丁連財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 若林正文 1988，「政治體制的轉捩點」，廖兆陽譯，《中日會診臺灣—轉型期的政治》，臺北：故鄉出版社，pp.1~95。
- 1989，《轉型期的臺灣—脫內戰化的政治》，何義麟，陳添力譯，張炎憲審訂，臺北：故鄉出版社。
- 朱雲漢 1989，「中產階級與臺灣政治民主化」，《變遷中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臺北青商會主辦。
- 吳乃德 1989，「不確定的民主未來解釋：台灣政治自由化現象」，中國時報主辦「中國民主前途」研討會論文，8月16~18日。
- 吳文程 「中華民國政治菁英結構的轉變：技術官僚與政治民主化」民主基金會主辦「中國的民主前途：臺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11月11~12日。
- 1994，「憲政體制、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東吳政治學報》—，第三期，pp.151~186。
- 周陽山 1993，「臺灣：擺盪在民主與專權之間的思考」，《自由與權威》，台北：三民書局。
- 胡佛 1989，「民主的價值取向」，自立報系主辦研討會發表論文。
- 1993，「選舉與政治轉型」，《選舉行為、憲政秩序與政治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臺大選舉研究小組。
- 胡佛 1983，「結構性的政治文化：類型概念及面向的探討」，中央研究院三
- 徐火炎 民主義研究所編第三次社會指標研討會論文集，pp.47~85。
- 徐振國 1990，「組合主義與經濟發展：臺灣威權體制的蛻變發展」，民主基金會主辦《中國的民主前途：臺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11月11~12日。
- 黃德福 1989，「政黨競爭與民主發展：台灣地區解嚴後的政黨政治」，葛永光等著，《現代化的困境與調適：中華民國轉型期的經驗》，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pp.105~123。
- 1990，「民進黨與臺灣地區的政治民主化」，民主基金會主辦「中國的民主前途：臺

- 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11月11～12日。
- 張茂桂 1989，《社會運動與政治轉化》，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 游盈隆 1993，“Elite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Taiwan Regime Change (1984~1987)”，《東吳政治學報》，第二期。
- 龐建國 1990，「臺灣地區的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民主基金會主辦《中國的民主前途：臺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11月11～12日。
- 1993，《臺灣經驗的理論與實際》，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 Almond, Gabriel A..1970,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 Almond, Gabriel A. & Coleman, James S..1960,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abriel A. & Powell Jr., G. Bingham. 1966, Comparative politics :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 ____ 1988,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 A World Vie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4th edition .
- Almond, Gabriel A. & Verba, Sidney. 1963, The Civil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istotle.1988, The Politics., edited by Stephen Ev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ndix, Reinhard.1964,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 Black, Cyril Edwin. 1966,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Harper & Row, New York.
- CEPD. 1989,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 Cheng, Tun-jen.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July), pp.471~499.
- Cheng, Tun-jen & Haggard, Stepan.1992,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Tun-jen Cheng & Step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 Chia T'ing Shou Ju Yu Chih Chu Tiao Ch' a Pao Kao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the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Taiwan Province Republic of Chia), (Taichung: the Bureau of Budget and Statistical Record Chu Chi T' su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1974).
- Chou, Yang-Sun & Nathan, Andrew.1987,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March, Vol.27, No.3, pp.277-299.
- Cross National Product, Published Annually by Directorate—General of Budgets, Accounts &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 Cutright, Phillips.1963, “National Political Development: its measurement and social correlates,” in Nelson W.Polsby, Robert A.Deutler, Paul A. Smith eds., Politics and Social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Dahl, Robert A..1971, Polyarch: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utsch, Karl W..1961,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September, pp.493-514.
- Diamond, Larry J..1993,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Larry J.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 Duverger, Maurice.1992,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 in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dited by Arend Lijpha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42-149.
- Eckstein, Harry.1965, Division and Cohesion in a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isenstadt, S. N..1963,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Joseph Lapalombara ed.,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isty Press.
- Ethier, Diane.1990, "Process of Transition and Democracy Consolidation: Theoretical Indicators," in Diane Ethier ed.,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Friedrich, Carl J. & Brzezinski, Zbigniew.1965,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o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ighley, John, Gunther, Richard & Burton, Michael.1992, "Elites Transformations and Democratic Regimes," in John Higley & Richard Gunther eds.,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owitz, Donald L..1990, "Comparing Democratic System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4, Fall.
- Hu, Fu & Chu, Yun-han.1990,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August 30-September2.
- Huntington, Samuel P..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il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1.X VII, No.3, pp.386-430.
- ____ 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 1971, "The Chang to Chang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 No.3, April, pp.283-322.
- ____ 1984,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 "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2, pp.193-218.
- ____ 1991, "Democracy's Third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 No.2, Spring, pp.12—34.
- ____ 1992, "Foreword," in Tun-jen Cheng & Stepan Haggard e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 Huntington, Samuel P. & Dominguez, Jorge I..1975,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Fred I. Greenstein & Nelson W. Polsby eds., Macropolitical Theroy,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3,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Inglehart, Ronald.1988,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2.4 December, pp.1203-1230.
- Kransner, Stepan.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 pp.223-246.
- Lerner, Daniel.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Glencoe, Ill , Free press.
- Levine, Daniel H..1988, "Paradigm Lost: Dependence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40, pp.377-394.
- Lijphart, Arend.1994, "Presidentialism and Majoritarian Democracy: Theoretical Observations,"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edited by Juan J.Linz & Arturo Valenzuel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 Grofman, Barnard.1986,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 ed.,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Linz, Juan J..1964,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in Erik Allardt and Yrjo Littunen eds., Cleavages, Ideologies and party Systems, Helsinki Westermarck Society/ ___ 1975,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Fred I. Greenstein & Nelson W. Polsby eds., Mocropolitical Theroy,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3,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___ 1990, "The Perils of Prea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4, Winter.
- ___ 1994,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 "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edited by Juan J.Linz & Arturo Valenzuel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 Valenzuela, Arturo.1994,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edited by Juan J.Linz & Arturo Valenzuel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 Stepan, Alfred.1978, 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Crisis, Breakdown, Reequilibra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eymour M..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___ 1990, "The Centrality of Political Cul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4, Fall.
- Michael Hsiao, Hsin-huang.1992, "The Rise of Social Movement and Civil Protests," in Tun-jen Cheng & Step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 Moore, Barrington.199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an Press.
- Nathan, Andrew J..1992, "The Effects of Taiwan's Political Reform on Taiwan Mainland Relations," in Tun-jen Cheng & Step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 Nie, Norman H., Powell Jr., G. B. & Prewitt, Kenneth.1966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in Jason L. Fin-kle & Richard W. Gable ed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John Wiley & Sons, Inc.

- Nordlinger, Eric.1987, "Taking the State Seriously," in Myron Weiner and Samuel Huntington eds.,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pp.353-390.
- O'Connell, Cf. James.1976, "The Concept of Modernization," in Cyril E. Black ed.,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Free Press, New York.
- O' Donnell, Guillermo A..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 Donnell, Guillermo & Schmitter, Philippe C..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s: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ackenham, Robert A..1966, "Political Development Doctrine in the American Foreign Aid Program," World Politics, January, pp.194-235.
- Powell, John Duncan.1970, "Peasant Society and Clientelist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64: pp. 411-425.
- Przeworski, Adam.1986,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 A. O'Donnell, P. C. Schmitter, and L.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ye, Lucian W..1966,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___ 1985, Asia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e, Douglas.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rev.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aum, Walter A..1975,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 Rueschemeyer, Dietrich & Evans, Peter.1985, "The State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ward An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 Underly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o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44-77.
- Rustow, Dankward A..1970,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A Da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April, pp.337-366.
 ___ 1970, "Democracy: A Global Revolution ? " , Foreign Affairs, Fall 69: 75-91.
- Sartorri, Giovanni.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___ 1964, "Neither Presidentialism Nor Parliamentarism,"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edited by Juan J. Linz & Arturo Valenzuel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chmitter, Phillippe C..1974,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 Review of Politics 36, 1: 85-131.
- Schumpeter, Joseph A..1943,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Geo. Allen & Unwin.
- Share, Donald & Mainwaring, Scott.1986, "Transition Through Transaction: Democratization in Braziland Spain," in Selcher 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in Brazil, Westview Press.

- Shiau, Chyuan-jang.1990, "Economic Liber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Structure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ponsored b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Pittsburger, Taipei, June, 5-6.
- Skocpol, Theda.1979,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o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37.
- Stepan, Alfred.1986, "Paths Toward Redemocratizatio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s" in G. A. O'Donnell, P. C. Schmitter, and L. Whitehead 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Stepan, Alfred & Skach, Cindy.1994, "Presidentialism and Parliamentar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edited by Juan J.Linz & Arturo Valenzuel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herborn, Goran.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No.103, May, p.341.
- Tien, Hung-mao.1992, "Transform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Party State: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Tun-jen Cheng & Step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 Verba, Sidney.1965,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Lucian W. Pye &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hitehead, Laurance.1986,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Democratization," in G.A.O.' Donnell, P. C.Schmitter, and L.Whitehead e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inckler, Edwin A..1992, "Taiwan Transition ?" , in Tun-jen Cheng & Step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A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aiw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This essay tries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aiwan by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the factors, process, and results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The main thesis is that to explain such a complicated phenomena as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aiwan, both the “preconditions” for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transition have to be examined. “Parsimony” may have to be compromised if all the variables of the transition are to be accounted for, such is the dilemma in theory construction.

Keywords : Political Transitio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Competitive Party System